

海纳百川2004年7月号

目录

大汉子：闲语法治、自由、民主与传统	1
林思云：为中国死刑的辩护	2
鲁肃：不相信理论和目的	7
回首五千年：中国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吗？	8
林思云：也谈孙中山的历史问题	10
郑若思：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名人批判之批判	14
芦笛：悼念杨小凯先生	17
六者：夏日读野史：大跃进时代	21
西乞术：读诗杂记：中国古代的生鱼片文化	36
湘君：自己的人生	44
幽灵：当代神曲系列：入狱	46
马悲鸣：殇高潮	48
逸峰：凑兴步韦应物韵	52

闲话法治、自由、民主与传统

大汉子

凡是把自由和民主神圣化的言论，都不过是政治呓语或愚人节“玩笑”——后者有趣，尚胜于前者。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西方社会日趋世俗化，政教分离和现代民主，便是这一世俗化过程的结果，或者说，是政治世俗化的集中体现。与此不同，自由最初则是贵族的，尔后也世俗化了，首先和主要表现为自由市场和（国际）自由贸易。

事实上，“民主”不仅一点也不神圣，甚至连“民主”是否一种价值，也争议很大。据我所知，对这种判断持反对态度的，在政治学领域占多数，一个鲜明和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熊彼得那个着眼于政治程序，即操作性的“民主”定义，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这在政治学界是种常识。在中国政治学界，就我个人所见，大概只有严家其先生还认为，民主是一种价值。但不少人觉得他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外行话”。平心而论，他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对他这种说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

重复地说，民主自由都不神圣。假如说，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与“神圣”有点关系的化，那就是“法治”了。“法治”，在西方国家也是逐步演化的。大体说，这是一个从上帝之法到自然法转变的过程。实证法学观点的出现，只是晚近之事，其时“法治”在西方业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了。

“法治”落实为国家政治制度，就是“宪政”，其核心在保障个人自由，即防止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和立法权）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如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立法和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来自民选，因此法治和宪政实际也是对“民主”的一种约束。其间的冲突恰好是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集中表现。2000年美国大选中最高法院所扮演的，其实正是以法和法治的“神圣”权威来制约民主的角色。

神圣的东西总是与传统有关，它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传统，在西方也就是来自基督教传统。在此种意义上，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虽然都是世俗化的，但它们既然都直接地立足于法治之上，从而也就与古老的基督教传统相联系。由此便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自由民主、法治（含宪政）、（神圣）传统。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发：价值上自由先于平等，而逻辑上法治则先于自由；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就是（保障自由的）宪政先于民主。然而如上所述，在西方，法治、从而宪政的确立，却不得不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宗教改革）的方式，从基督教那里“借用”某种传统的神圣权威。足见，对于主张实行宪政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反传统、甚至彻底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想象的！

可喜的是，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者，自90年代开始，已经开始逐步与五四以来那种彻底反传统的流行观念划清界限。有些学者（如西风）在尝试从黄老之学（包括司马迁）中发掘自由主义的因子，而更多的人（如王怡等）则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的假说，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探讨都是初步的，甚至可能是幼稚的，但我认为，其思路对头，因此值得关注。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为中国死刑的辩护

林思云

屡屡听到这样的批评：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并由此推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最不讲人权的国家。这些批评有些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权组织，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在海外的“异议人士”。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中国2003年处决了1060名死刑犯，但西方媒体估计中国实际处决的死刑犯人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数字的总和。

不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如何，即使按照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中国也是世界上执行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乍一看这个数字，确实会让人联想到中国是一个残酷的国家，西方人权组织对中国“酷刑”的批评有理。可是细读一下西方媒体的报道，却发现他们在批评中国大量判处死刑的同时，却回避了或很少交代为什么中国会判这么多死刑犯，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处以死刑的。

中国的死刑犯是一些什么人呢？首先中国的政治犯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被西方媒体称为“异议人士”的不同政见活动家，未听说有被判处死刑的。中国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刑事犯和经济犯，我们不妨分析几例中国被判死刑的案例。

报道一、【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疯狂盗窃、破坏农村电力设施，造成近万亩农田无法灌溉，近20个村庄农民吃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导致直接经济损失10万余元。4月14日上午，罪犯张林在代县被执行死刑。

2002年7月，刑满释放的张林与同伙刘文宜（在逃）从灵丘县窜到繁峙县开始作案，从2002年12月5日开始盗窃农村变压器，先后在灵丘、繁峙、代县盗窃、破坏变压器16台……。法院认为，张林伙同他人大肆破坏正在使用的农村电力设施，使集体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并造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后果，其行为确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且罪行特别严重，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一项规定核准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张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忻州日报）】

报道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毛元林等5名被告人做出了一审判决，毛元林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4月至2003年5月间，毛元林、周仕刚等5名被告人相互纠合，先后在贵阳乌当区水田镇猫冲、水田街上、蔡家关等地盗割正在使用的35千伏、10千伏输电线路导线共计746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法院认为，毛元林、周仕刚等5名被告人盗割输电线路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应依法严惩。（贵阳日报）】

报道三、【2月26日上午，梓潼县在黎雅镇召开公捕公判大会，疯狂破坏、盗窃电力设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万余元，间接损失近百万元的犯罪团伙首犯何正云，被执行死刑。自1999年2月至2003年3月3日，这个破坏、盗窃团伙破坏、盗窃变压器就达38台，输电线4次，总价值37万多元。造成梓潼、江油两地厂矿单位停产，农村2.99万余亩的农田无法灌溉，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2月25日下午，当省高级法院宣读死刑裁定时，一直心存希望的何正云听到维持原判后，当即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一直不停的念叨着：“我当贼，怎么会判死刑呢？我真的没有想到。”（四川农村日报）】

这样因破坏盗窃电力设备被判处死刑的案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西欧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美国日本等国规定只有人身伤害罪才能判处死刑。在西方人看来，只是因为盗窃就判处死刑，似乎是太残酷了。上面报道中的犯人自己也说：“我当贼，怎么会判死刑呢？”那么中国政府因破坏盗窃电力设备判处死刑的案例，是不是真的残酷过分呢？

西方人士批评中国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有他们想象之外的另一幅国情图画，我们再看一则中国的消息。

【新华网北京2004年6月13日电：由于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呈上升趋势，加上电力供应形势紧张，今年全国平均供电可靠率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在全国供电形势吃紧的情况下，电力设施屡遭破坏不仅直接威胁到电网安全，使原本严峻的供电形势雪上加霜，也给国有资产带来严重损失。

电力设施犯罪愈演愈烈，为了保证迎峰度夏工作平稳运行，加大对电力设施犯罪的打击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电力设施遍布城乡、野外，加之近年来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活动升级，保证供电安全任务艰巨。

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已从拆盗单块塔材，发展到团伙盗窃数以吨计的塔材，从盗割低压线路发展到超高压线路，从不带电作案发展到带电作案，从盗割几十米导线到几万米导线，从暴利驱使发展到炸毁电缆、爆破电杆、纵火焚烧电力装置等蓄意破坏电力设施。作案手段智能化、专业化，盗、运、销一条龙。不法分子配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具有一定电力专业知识和防触电能力，采取带电作业，夜间流动作案。他们分工明确，先与“厂家”签订“供货合同”，得手后直接送到“厂家”，连夜将赃物化为铝锭，使侦破、取证更加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至2003年底，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共发生电力设施破坏案件4万多起，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2004年一季度发生破坏、盗窃案件近1925起，被盗塔材一万多件，输电线路973千米，直接经济损失2500多万元。而城市70%的输电设备故障是由外力破坏引起的。今年2月，北京供电公司110千伏清旺备用线路被盗，造成3座高压铁塔折断，由于导线下垂造成北京轻轨、京包铁路及公路交通一度中断；去年6月，国家重点工程三峡至广东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铁塔因导线被盗割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126万元，影响了三峡至广东工程的进展；……】

看到以上的消息，西方人权人士不知会有何感想与评论。中国的国情，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刁民太多”。这些人（在这里对他们不礼貌地称为“刁民”），为了个人的金钱欲望，竟然大肆破坏国家的电力设备。除了电力设备被破坏的直接损失外，停电断电造成的间接损失更大。比如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因为停电失灵，就会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炎热的夏天因断电空调无法使用，会造成身体虚弱的老人中暑死亡；2001年还发生过首都机场的电线被破坏盗走的案件，这弄不好就会引起机会人亡的惨剧。可以说盗窃电力设备，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谋财害命，判这些人死刑，能说太过了吗？

现在中国的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呈上升趋势，除了加大刑法，用死刑震慑罪犯，达到减少犯罪外，并没有别的更好方法。也许有人说：“这些人盗窃电力设备是因为贫

穷。”但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不能说因为我穷，我就有理由抢劫盗窃。也许会有人说：“一旦这些人有钱富裕了，他们就不会盗窃电力设备了。”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们盗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贪婪。

为了贪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刁民，让他们富裕起来，也许不会再干赚钱不多的盗窃电力设备，但他们又会干其他违法赚钱的坏事。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富裕起来的刁民，因为贪婪而干出伤天害理事件的报道。

报道四、【1996年5月16日，李荣平、徐发泽与徐发建为试制合成燃料，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进甲醇120公斤。徐发建明确告诉李荣平：“甲醇有毒，在操作时应戴防毒面具，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李荣平认为甲醇价格便宜，兑成“白酒”销售有利可图，便大量制售。6月15日，李荣平、蒋红梅、徐发泽再次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回甲醇3300公斤。尔后，李荣平指使尹广才用甲醇加水兑制“白酒”销售。尹广才便带领蒋支富、杨贵平两次兑制有毒白酒10000余公斤，并由尹广才、蒋支富、杨贵平、蒋红梅分别销往会泽县的大井、者海、马路、迤车等乡镇。7月10日，李荣平等人得知其所制售的毒酒已致死人命，即指使尹广才、蒋红梅将剩余毒酒倒掉，并在酒罐中注入食用酒精兑酒，企图逃避罪责。其所售出的毒酒被人饮用后造成175人甲醇中毒，其中32人死亡，3人重伤。】

最近报道一些婴儿吃了伪劣奶粉变成畸形大头娃娃的事件，这批毒奶粉造成多个婴儿死亡和伤残，这样的伪劣毒食品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还有不少。除了立即造成伤亡的剧毒食品外，更多的毒食品是间接伤害，特别是致癌物质那样的慢性伤害。比如最近报道的含有高致癌物质的“民工米”、“漂白粉丝”、“染色酱油”等，其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更是难于估计。对这些制造伪劣毒食品，损害人们健康性命的刁民，又会有多少人反对判处他们死刑呢？

有人也许说：“那些制造毒食品的人是因为没有知识，愚昧犯罪。”这个说法很难成立。上述毒酒案的主犯李荣平，他明确被告知甲醇有毒，他绝不喝他自己制造的毒酒，他知道工业甲醇对人体有害，只是不知道会毒死人而已。那些制造贩卖“民工米”、“漂白粉丝”、“染色酱油”等人，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样的食品对人体有害，自己并不食用，而是拿去坑害别人。

有财力修建伪劣酒厂和伪劣奶粉工厂的人，相对盗窃电线的刁民来说，算是富裕起来的刁民。可是他们富裕起来后，并不会立地成佛，他们的贪婪又促使他们去干造假食品、假药的伤天害理事情。据中国报道，2001年中国卫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185起，15715人中毒，死亡146人；而关于食品内含毒物的长期毒性或致癌情况的调查，在中国大陆却还是一纸空白。假如西方国家也出现这样大量的伪劣食品，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难道不会有人提议对伪劣食品的主犯判处死刑吗？

中国另外一个常被西方人权人士批评的残酷，就是对经济犯的死刑判决。经济犯有多大危害呢？中国曾判处广东省无业人员廖少辉、廖少武兄弟死刑，理由是他们利用假身分证及假资料等虚开一千余份假发票，虚开税款一亿五千四百多万元，目前尚有一亿余元未被追回。开假发票和制造伪币的性质是一样的，会对国家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的假发票愈演愈烈，如果不用死刑这样的极端手段，又怎样遏制那些到处兜售假发票，破坏扰乱国家经济的刁民犯罪呢？

这些年来，中国官员的贪污更是新攀一个台阶，贪污几百万已是平常，贪污几千万也不算稀奇了。据中国学者胡鞍钢估计，中国贪污腐败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每年平均高达GDP比重的14%以上。如果西方国家也有这么多严重破坏国家经济、损害人民福祉

的社会害虫（贪官），我看西方国家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宽容吧？

盗窃电线的人，可以说他们犯法是因为“贫穷”；制造伪劣食品的人，可以说他们犯法是因为“愚昧”；可是贪官既不贫穷也不愚昧，他们犯法的原因就是因为“贪婪”。其实盗窃电线的人、制造伪劣食品的人、以及贪官他们都是一类人，都是因为贪婪钱财而不惜犯法的“坏人”。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没有当上官，只好靠盗窃或造假赚钱；后者当了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贪污受贿敛财。

有人说：“中国杀了这么多贪官，也没有制止住贪污腐败，因此死刑对遏制贪污腐败的作用不大。”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正因为处死这么多贪官，依靠死刑的“威慑作用”，才把中国的贪污腐败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取消了贪官的死刑，中国的贪污腐败恐怕就会达到失控的地步。几位美国专家曾经作过这样的研究：他们对美国在过去25年处死的717人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每处死1名杀人犯，平均可以使18人打消杀人的念头；而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速度越快，其威慑力越大。因此我们不妨这样推论：中国每处死一名贪官，就会使几十名以上的贪官收敛贪污的念头。

新浪网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约有75.8%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只有约13.6%的人支持废除死刑。大家为什么反对废除死刑呢？最典型的意见是：“如果没有死刑了，那些贪官岂不是更加无所顾忌？还有那些杀人的、抢劫的怎么办？现在社会上的犯罪已经很多了，这样一搞，老百姓就更没有安全感了。”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判处死刑最多的国家，但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并不认为中国的刑罚太残酷了。那些谴责中国刑罚残酷的西方人士，那些呼吁中国废除对经济犯的贪官判处死刑的西方人士，如果他们去中国大陆搞一个民意调查就会发现：中国老百姓不但不认为贪官判死刑太过残酷，反而认为贪官判死刑的太少了，应该更进一步加重对他们的刑罚。

这个结果可能会让西方的人权人士感到意外：“我们反对死刑是帮你们中国人声张人权，你们为什么反对呢？”可是这些坐在大洋彼岸高唱人权赞歌的西方人士，他们没有受过贪官的切身之苦，没有受过假食品假药的切身之害，没有受过断电停水的切身之灾，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赞成死刑。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刁民，没有中国这么多的贪官，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可是他们却要求中国照搬他们国家的法律。我看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傲慢。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占领军当局曾出于“人权”考虑，在伊拉克废除了死刑。可是在美军移交政权后，新上台的伊拉克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恢复死刑。因为伊拉克人深深明白，要想在伊拉克恢复治安和秩序，没有“死刑”这张威慑王牌，那是不现实的。美军废除伊拉克的死刑，完全是脱离当地现实的单方面“蛮行”。或许这个蛮行是出于好意，但它却给伊拉克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伊拉克恢复死刑的事件，应该给傲慢的西方人权人士一点触动：不要把自己国家的法律照搬到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去，不要轻易批评其他国家的法律不讲人权。

前些年一名美国中学生在新加坡用涂料涂污了几部汽车，被新加坡法庭判用藤条打屁股，结果美国社会闻讯哗然，指责新加坡法律侵犯人权。可是这些人权人士却忘了，新加坡之所以社会治安良好，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就是因为存在“打屁股”这种他们看来非常不人道的法律。中国为什么每年要判那么多死刑犯？用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刁民太多，所以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在不照搬西方国家法律的问题上，新加坡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最后特别想说一句：迎合西方人权人士废除死刑倡议的一些中国民主活动家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废除死刑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平，反而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不相信理论和目的

鲁肃

民主主义和各类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远比中国人想象的深刻的多。本人已经在以前的帖子里提到了，今天再提出来重复一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科学理论。马克思本人基于这种思想方法对社会和经济作了一番不能不说深刻的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被使用同样方法的人们研究之后，认为是正确的，从而信奉为主义。即使后来有人对其中的逻辑发现错误，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但所持的基本方法依然一样，那就是：对理论的信任，对人类思想的信任。他们认为，只要人类不犯错误，人类的理论和结论就应该是正确的，关键是如何避免错误。

大汉子网友和我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特别相信理论就是人类思想而且是可宝贵的。鲁肃则不认为理论是人类思想的全部，也不是其中的高级表现部分，我信赖自然法则，无论这法则是不是被发现了，即使它永远无法被发现，甚至被逼近，我依然相信它作用的‘高明’。我对试图发现这些法则的理论努力也很看重，但对它们采取的是深刻的怀疑态度，在我看来，理论无非是一些对自然法则的解释尝试，我用不着不放心自然法则，而去信赖可怜的人间对自然法则的自以为是的解释。

林先生的‘目的’超越手段的思想也是出于对人类思想的信赖和对自然法则的怀疑。他相信，人们所设计的目的正当，可以被人类自己判断，并坚持。手段无非是寄生在目的上的衍生物，无论目的和手段都不是自然的一部分，目的又理论导出，手段根据目的的实现选择。这些基本假设，我都不同意。我说他‘茧子太厚’就是说他有很多不自觉的前提，习惯于从结论走向结论。

我不相信任何目的的正当性，我相信手段的正当性，并相信正当的手段在无法究竟的自然法则的天晓得如何的作用下，会自然导致结果（而不是目的），而这结果应该是无害甚至有利的（这也无从判断）。那种认为目的的可以确立，手段的从属，在我看来是马克思在形成他的主义之前就已经假设好了的，它和马克思主义自身一样，是对理论这种思想方法的过分信赖，和对理论要探讨的对象自然而然发生的作用不够放心。

民主主义在思想方法上与此正相反，他们追究手段，不理睬目的。芦笛作为一个被动地受了共产党教育体系包围多年的‘老’同志，却能够自发地做到对上述思想方法的批判，是非常可佩服的，尽管他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所发。也正是在他的言论的不断启发下，鲁肃才能够就自己所擅长的抽象说几句话，老芦的文章能做到寓启发于热闹，是我看重他议论的原因。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中国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吗？

回首五千年

今天的有关讨论，我个人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在围绕这个观点的一些概念上，我觉得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希望这个讨论帮助我有所收获。中国政府是一个共产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众所周知的是：尽管在今天的党内，也已经没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了。马克思主义早已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名存实亡。那么，难道这个名存实亡本身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这正是今天讨论的题目。

政治的本性是实用主义的。这已经可以从上述名存实亡的事实中看出来。我个人不反对政治实用主义，我还赞成它。政治不是宗教，它处理的就是现世的现实，当然要讲求实用了。所以，既然我提出中共今天应该彻底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实亡”之后，连“名存”也不要了——即取消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我也就实用的角度来谈一谈我的理由。

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共权威的基础

这听上去不符合逻辑，但是事实。虽然中共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作信仰，并以之命名，但是中共的实质早已否定了这个表面的现象。即便它过去是，现在也肯定不是了。既然这样，有什么理由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共权威的基础呢？难道7000万党员会不知所措？不会，我已经说过，党内也没有人信了；难道13亿中国人会起来反对？放心，事实和经验早已从反面教育了全中国人民，没有几个人会起来维护马克思那一套的；难道中国共产党这块牌子会显得不伦不类？好办，中国共产党自己给自己改革名字好了，这应该是实用主义的最好体现。话说回来了：难道中共自己的命运高于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命运吗？

除了上述的问题，我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说出一些好处。比如，我今天楼下的一片帖子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人这样说：“如果美国用10年20年时间打赢了这场“反恐反邪”的战争，它下一步会不会就来收拾中国？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是的，中国不能被动等待，中国要主动出击。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调整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争取获得最大可能的外交和国际事务的空间。也就是说，韬光养晦并不等于无所作为。那么，拓展国际和外交空间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广交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利益集团。要这样做的话，中国扬弃马列主义，而开始弘扬中华传统。以中华文化中的“中和”、“仁”以及“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为中国赢得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这将为中国赢得武力和金钱所无法获得的国际影响和地位。现在的中国，因为其不愿放弃马列主义大旗（因此“和平共处”和“和平发展”口号也没有人信），已经被美国的“四大自由”和人权外交逼到了死胡同里。当然，好处远不止这一点。

理由之二：扬弃马克思主义不会导致中国和中共的溃败

楼下的网友“丁春秋”和“operator”担心这样的“换旗”会引起动荡和自乱阵脚，用丁兄的话：“换，必须先倒旗了才能换，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是不行的，战士们一刻都不能没有看到旗帜的存在。溃败，很可能就发生的换旗的瞬间。”他的顾虑就是换

旗那个瞬间可能发生的溃败。我想用两点来回答。其一，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许多问题长期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上面讲到的中国外交空间就是一例，中国已经被美国压得空间日益窄小，不做点什么就只能束手无策了，就等着美国全球战略胜利后的审判了。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其二，无论是中国的命运，或者是中共的命运，都不可能在此现状毫无变化的情况下渡过危机和得以长久。改变是必需的，风险也是必需的，只是改变多少的问题，风险大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扬弃马列比走全盘民主的道路，对两者的可行性都要大得多，风险也笑得多。

请诸位批判。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也谈孙中山的历史问题

林思云

读了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即所谓“孙文卖国档案”，不禁为其满纸的“书生气”而哑然失笑。中国话的“书生”翻译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国的“书生之见”与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常把只知道读书，不懂得社会实际的人称为“书生”。袁教授读书破万卷，但他这篇力作满篇“书生之见”，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中国有句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国历次革命中，书生秀才们煽风点火，抛舆论造声势，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真要书生秀才们去领导革命，他们就不行了。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书生发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煽动起一场戊戌变法。但这帮书生秀才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性，单单凭着书本知识，试图在中国照搬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很快就失败了。

陈独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学者，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可是让他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不行，勉强当了几年总书记便共产党的自己人赶下了台。193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派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试图让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苏联学习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只知道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企图在中国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结果也是输的一败涂地。相反毛泽东既没有骄人的镀金学历，也没有外国老板的特别关照，可是毛泽东最后不仅当上了中共党主席，还领导中共从山沟里走进了北京城，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试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陈独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书生领导的话，会有现在的结局吗？据说邓小平曾讲：“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中共党内不乏学问过人的大学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由他们这些书生领导，但都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是在这些书生领导不了中共的情况下，才脱颖而出当上了中共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些书生领导不了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不懂得现实中的“政治”与书本中的“主义”和“原理”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我们看一下袁教授的“书生之见”吧。袁老从书缝中找出不少孙中山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或准备签订的）所谓“出卖中国利益”的文件证据，并在最后郑重其事地说：【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

之所以说袁教授是“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用书本上的“国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实际现实中的“国家利益”。袁老指出孙中山曾经试图“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并把这作为孙中山卖国的铁证。当然袁老指出的这些证据确实属实，不过据此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倒是显出袁老天真的“书生气”。

当时孙中山一批人结成革命党同盟会，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就是暴力推翻满族人的异民族统治，恢复汉族人的主权。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在经费方面，革命党没有政权，他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资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经费，向外国政府借款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可是外国政府并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不给他们一些利益，他们是不会随便借钱给革命党的。孙中山“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不过是革命党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错误言行”。

世间没有免费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对此有所考虑。尽管武昌起义成功，可是革命军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满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战争进行的不顺利，革命军与清政府军长期对峙，这时外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对于外国列强来说，是支持革命政府还是清政府，取决于谁给他们的“好处”多，也就是哪个政府“出卖国家利益”较多，他们就支持哪个政府。

因此当时革命家们的策略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复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把满蒙疆藏“出卖”给列强，以换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以前清政府只准许汉族在十八个内地省份居住，这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和云南，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是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个内地汉族人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革命只要恢复了内地十八省的汉人主权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和满洲（东三省）的主权都可以放弃。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打出的革命军旗是“十八星旗”，这“十八颗星”就是代表内地十八个汉族人居住的省份，后来也有人称其为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坏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让满蒙”的承诺，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未雨绸缪策略能力。不过后来南北战争很顺利，满清朝廷在袁世凯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让权，这时“出卖”满蒙疆藏就没有必要了，孙中山对日本做出的“卖国许诺”也就自然收回，没有变成现实。这种政治策略，对于“兵不厌诈”的政治军事世界来说，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国偏有这么一帮读书人，专门喜欢从书本里引经据典，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从孙中山的故纸文件中考证出一堆“卖国罪证”，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大帽子。

近代中国历史上当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算不上什么学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只念过私塾就不必说了，孙中山的学历也和毛泽东差不多，算是专科文化程度吧（孙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发材料了），蒋介石的学历也不高。国民党中有像胡适那样舞文弄墨的大学者，他的理论水平比蒋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让胡适来领导国民党却是不行。有人说“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说这句话的人就书生气了，因为他把政治看成一种崇高的事业。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脏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别崇高伟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骗子的一种。政治家不是宣言“仁义道德”爱国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谋求实实在在利益的“小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而且国际政治不受法律的约束，撕毁条约，背信弃义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战期间，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进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后来美国与中共建交而抛弃台

湾的行为，也曾被蒋介石骂为“背信弃义”。中国祖宗流传下来的兵书里讲得很明白：“兵不厌诈”，可是爱谈论仁义道德大道理的书生们，却偏偏不读这些讲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书。

在辛亥革命的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危机，并不是满蒙领土被日本吞并，而是整个中国被列强瓜分。中国革命家的第一任务就是保存中国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强瓜分，而不是保全满蒙的领土。如果中国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谈得上保全满蒙？孙中山放弃满蒙，保全中国本土的想法，不过是在当时紧迫情况下的丢卒保车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卖国”的罪名，岂不是太冤了？

毛泽东打仗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不计较一个城池的得失，保存实力最重要，有了实力，失去的城池，以后还能收回来。在辛亥革命的紧迫环境下，保全中国本土十八省的统一是最首要的任务，只要中国本土的统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国的灵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富国强兵，即使把满蒙疆藏“出卖”了，日后也是可以收回的。台湾不就是在被“出卖”后又收回来了吗？

退一万步说，“出卖”的领土即使收不回来了，也未必是绝对的坏事。我们不妨反过来看问题：领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别是武力强占的领土，为了维持镇压这些地方的反叛势力，国家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这些不安定的领土，不但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和负担。战后英法两个最大的殖民国家，被四处蜂起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搞得头疼脑热，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相反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丢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领土也缩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国家的核心部分，可是这两个战败国家却出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缩小了领土，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丢掉领土反而成为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福音。

前苏联在二战后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日后屡屡成为苏联政治地震的发源地，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发起的独立运动，最终引发了苏联的总崩盘。如果斯大林当时没有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联盟也许会更长寿一些。同样中国辛亥革命后，如果像革命军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样，中国只剩下本土的汉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独立出去，现在中国就少了很多头痛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现在更好。事实上西藏、蒙古、新疆这些地方给中国本土带来的政治经济负担，远大于它给中国本土带来的利益。

如果当年罗斯福总统没有好意把台湾归还中国，让台湾独立了，现在中国就不会有烦人的台湾问题。不幸的是，现在台湾问题正成为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的震源地，这个地震源一旦爆发大地震，说不定真的会引发中国像前苏联那样的总崩盘，这正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假如当年孙中山一伙革命党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卖”出去，反而为中国今后的长期安定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现在说不定要感谢他们自己背下“卖国”的骂名，造福了中国的老百姓。

尽管孙中山是一个书生气比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见识还是远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谓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不过是他这样迂腐的书生难于理解而已，头脑灵活的政治家们大概没有不理解的。我们不妨反过来看袁老给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料，会看到孙中山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有灵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中国最需要头脑机动灵活的政治家来牵引。古

训云：“书生清谈误国”，可惜中国有太多迂腐的书生，却有太少灵活应变的政治家，不免让人折腕而叹。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 名人批判之批判

郑若思

大约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的老师去东德访问，回来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天啊，马克思有私生子！”而且这私生子的故事还不是来自市民的口头文学，而是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原来，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夫人燕妮忠贞不渝，竟然与相貌、教养都与燕妮相差甚远的女佣海伦共赴巫山，珠胎暗结，引发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最后老马那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睿智大脑灵光一闪，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恩格斯于是替朋友两肋插刀，不仅向燕妮谎称自己是那孩子的父亲，还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

此事之所以令我震撼，还不光是因为突然发现伟大导师其实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更大的惊诧在于同样是GCD，东德共产党在对待革命导师的问题上与我们的伟光正有着天壤之别，东德至少还把他们当成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而我们这边，马克思是整天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埋头写作、脚底把地板磨出凹槽、沿着陡峭的科学大道攀登的圣人（我在伦敦的时候特意去找过，结果证明是个天大的八卦）。别说马克思的私生子，就是鲁迅原配朱安夫人，又有几人能知？当年北京阜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里，根本就看不到朱安的照片，不然，二奶许广平的来历如何说得清？岂不是玷污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最近程映虹先生写出了洋老马这段轶事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程先生说：“一个欧美大学者和思想家有个把情人和私生子算不得丢脸的事，只要他不把自己当作完人，他的崇拜者也不把他当作圣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给人间播火的圣徒，而崇拜者们更把他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连他的婚姻都神圣化，那么任何品德上的瑕疵，或者任何一个家庭中都可能有的隐私都会变成摧毁信仰的重磅炸弹，无数只手就会严严实实地把它们遮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今天在所有仍然把这个大胡子犹太人的画像挂得高高的地方知者寥寥的原因。”

由此我想到如今正在见坛上议论得火热的鲁迅。鲁迅的可悲其实不在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我们的伟光正不由分说地把他神化为根本没有缺陷、甚至缺陷也是美德的圣人。

这是一场迟早会被揭穿的骗局，果不其然，当鲁迅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是一个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小人，偷看弟媳洗澡的色鬼、日军入侵便躲进内山书店的懦夫，总之，私德不值一提。私德的缺陷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了一颗颗摧毁鲁迅的重磅炸弹。

其实，鲁迅的私德尽管不好，但是他的缺点只是人性的弱点，是和很多人共同的弱点。何况他并不是政治家，不掌握国家命脉，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无行，除了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以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几近于零，诸君花费如此之笔墨揭批鲁迅的“生活作风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若论个人生活的荒唐，萨特恐怕在鲁迅之上。西蒙德·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老态龙钟的萨特仍拥有数名年轻貌美的

情人，将波弗娃丢在一边。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去否定存在主义的价值、否定萨特的思想成就，这就是西方人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鲁迅还原成和同时代的林语堂、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一样的普通文人，还会对他如此苛求么？

当圣像倒掉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但是围绕脐下三寸打转的道德批判是时间和精力浪费，我等凡夫俗子可能有的缺点，再伟大的导师、旗手都会有。倒是这些所谓导师和旗手的思想言论，到底对后世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是我们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倒掉的“圣人”，应该采取历史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

依我之见，洋老马那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原则，才是殆害后世的毒瘤，危害远比他和海伦的那宗糗事要大得多。我倒觉得假如海伦有杨贵妃那样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花容月貌，让洋老马写完《资本论》以后“从此导师不早朝”，靠《资本论》的学术成果当个经济学教授，不要拿什么暴力革命理论去害人，倒是地球人的造化。

同样，鲁迅的害人之深，不是什么偷窥入浴或是包二奶，而是如老芦所说：“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骂人的痞子。”

老芦对于鲁迅的肯定，我也深有同感。即“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己的劣根性。”

糟的是目前对鲁迅的批判，有的连道德批判都算不上，遑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简直就像文革专案组那样，以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细节，给鲁迅罗织罪名。楼下有篇《为什么你们对鲁迅那么宽容》，便给鲁迅戴了顶“媚日”的大帽子，但是作者又找不到像样的通敌证据，就把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说成是日本特务，其理由曰：“一是他曾代为管理日本皇军的军事胜利品——中国的出版社和书店，二是他在战败后是上海几十万日本“侨民”（以日本民族的特殊性，称其为侨民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二战中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一个没有穿军服的皇军）公推的领袖。”内山曾经接管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该公司根本不是中国的出版社，而是1917年由美商创办，地址在上海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1935年时资金约100万元，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西书出版发行单位之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内山书店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店，日美宣战，美商撤走，由内山书店接管，这与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军事战利品。抗战胜利后，中美图书公司仍由美商经营，后来则被中国人买下来。

至于侨民领袖一定就是皇军，就一定赞成侵略战争，这种逻辑只能蒙骗小孩子。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里那个犹太音乐家曾经受到德军军官保护，这其实是电影原著者的亲身经历。既然穿着法西斯军服的人都会对战争感到耻辱，那么没有穿军服的侨民就一定是一块铁板么？

很多批鲁文章喜欢拿鲁迅和日本人的交往说事，大有不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让鲁爷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罢休的气势，但是下笔洋洋洒洒最终却拿不出一块像样的钢鞭材料，证明鲁爷曾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出卖了民族利益。批了半天鲁，文章里还是透着一

股“鲁”味，那“轻狂浮躁，只知骂人”的痞子魂，闹了半天还附在批判者的身上。从而证明鲁爷的毒素的确是渗透了我们的骨髓，不可救药。哀哉！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悼念杨小凯先生

芦笛

杨教授患恶疾的事，早就知道了。记得网友几个月前曾转贴过他肺癌已到晚期的消息，当时就极度震惊。因此可以说，这噩耗早在预期之中。尽管如此，等到它真的传来之时，我却依然感到说不出的震惊、痛楚和惋惜。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去世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内心激荡，光是这点就能说明我对杨先生的崇敬。

随后就看到网友也好先生要我写篇纪念文字，说我在网上嘻笑怒骂，目空一切，睥睨众生，而且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都大有鲁迅“一个也不放过”之余风，但杨先生是我敬重的少数人之一，理应写篇东西纪念，云云。

看了那帖子，我只觉得说不出的惶恐：我这人其实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内心极度不自信，如此成功的名人，轮得到我这“废了儿”来写纪念文字么？再说，我和杨先生素不相识，对人家根本谈不上什么了解，要写文字纪念，又从何说起？

但想了想，决定还是来写此文。当然不是自信了解杨先生到了可以谬托知己的地步，也情知自己说不出什么有份量的话来，但一个人的逝世能引动素昧平生、远在万里之外的陌生人的不尽哀思，以致非得形诸文字传达心声，这本身就是一般人无从指望的哀荣。

杨先生和我是同代人，都是在文革中的青少年，所谓“老三届”者。不过两人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因为亲人在57年在文字狱中落网，从孩提时代起，母亲教育我们的口头禅便是：“祸从口出，千万不敢乱说！”这种家庭教育延续到文革，便形成了我明确的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我不但将“苟全性命于乱世”当成了一种高度的人生智慧，而且从智力上鄙视那些悟不出世道党心之险恶，非要去与虎谋皮的造反派风云人物，尽管我由衷地同情他们的事业。

杨先生为写《中国向何处去》被抓起来，我也隐约知道点，全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不过那轰动全国的作品倒不幸看见，看见的全是批判“省无联”的文章，从那些东西里，可以大致判断出他的论调是“极左”，也就是比毛本人还左，主张“二次革命”，以期实行彻底的直接民主。这种激进的民粹主义似乎是当时所谓“异端思潮”的共同特征，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李一哲大字报，今天看来应该是非常荒谬的吧。

这观点对幼稚的我当然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我远比那些革命“理论家”们世故，本能地知道不但它会激怒既得利益阶层（即毛要打倒的党官僚），也会引起毛本人的恐惧。如我在几十年后写的《先知先觉的悲哀》指出的，这些“理论家”们是被毛的“理想主义”的零言碎语欺骗误导了，却没能看到毛本人深重的叶公好龙特性。

因此，“杨小凯”这个名字，在当时对我只意味着“又一个不识时务的蠢才”，很快就和其他文革中众多的风云人物一样，给抛进了忘川。

再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美国出版的两《春》和香港的《争鸣》杂志上，不过变成了“杨曦光”。他对文革的评价的探讨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篇文章的编者按介绍说，作者就是在文革中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捕的杨小凯，现在则是澳洲莫纳什大学

的经济学教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多数都是没什么学问、只有一股子心劲的革命家，早就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连“帝国落日”的黄昏美景都谈不上。如同大跃进炼出来的那些“牛屎疙瘩”一样，他们最初的问世与后来的顽固存在只有一个意义——为那荒谬时代作证。何物杨小凯，却能在十年铁窗中熬了下来，既没有折断意志的脊梁骨，也没有变成知识残疾，而且竟能凭赤手空拳在鬼子的学术界中打出了一片出头天？

我不禁为自己汗颜：人家风起云涌地闹革命时，我一天也没荒废过，后来下乡进厂也也从来是手不释卷。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立刻就进了大学，沿着学术阶梯一级级往上挣扎，却还是个牛马走，而人家光坐牢就是十年，后来又被拒诸高等学府门外，只能在某大学数学系当个旁听生，却能如尼采描述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跨到彼山的山巅！

须知这和许多老知青成了文学家还不一样。所谓“人穷文工”，文革的折腾其实有利于文学家的诞生，但“硬学科”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过人的才智和努力，休想走杨先生这样的捷径。这该是怎样的self-accomplishment！

从此便对杨先生的文章特别上心，陆续看了他狱中生涯的回忆。类似的文章很常见，最富有代表性的便是张贤亮的“劳改文学”，刘青的回忆录也庶几近之。但杨先生的回忆却有个明显的不同：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觉醒过程，让我不胜震惊地发现，尽管他在狱内，我在狱外，彼此的心路历程却惊人地相似，同样有个“狂热崇拜革命——幻灭——深思——从理性上批判、感情上唾弃革命”的过程。

记得杨先生说他发现国府30年代的立法就非常完善，连公司法都推出来了，不由得肃然起敬，如同《悲惨世界》中的某人物一样，“心里冉冉升起了一轮巨大的红日”。那一瞬间，我只觉得目瞪口呆：这仿佛是在说我自己的经历一样！

更令我震动的是，杨先生对革命的看法，竟然和我如出一辙。后来在网上看见他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批判，字字如同出自我口，类似的话我也写在和思云与易明等人关于暴力革命的论战之中，但人家每句话都说得比我精彩百倍。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不以为然和对英国模式特别是对洛克的推崇，都和我几乎一模一样，更重要的是他对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精彩论述，给了我极大的启迪。

老芦早就过了崇拜人的年龄了，但对这种杰出的哲人，我不能不倍觉崇敬。一个人引起他人这种感觉，无非是两方面的，或是人格的感召，或是智力上引起的钦服，而杨先生则同时在这两方面让我由衷地折服。

我在旧作中曾对郑义、杨先生和我这三个同代人作过比较，试图说明国人要摆脱党文化的毒害是何等艰难。我也看过郑义先生发表在《争鸣》上的回忆录，也发觉两人之间心境中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和杨先生一样，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崇拜共党到肯定国民党的回归，发现了中共革命其实是历史的大倒退。但遗憾的是，郑义先生竟然至今还陷在党教条中出不来，仍然认定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那副虎狼药，却死也看不出中国之所以成了今天这个病入膏肓的鸟样子，全是前人一世纪以来川流不息、马不停蹄地滥用那副虎狼药给糟害的。记得我曾无任惋惜地慨叹道：老郑就像我家养过的那只小猫，因为严峻的环境给养僵了，这辈子大概再没长成大猫的希望了。

不过和他人比起来，老郑该算是佼佼者了。当年以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全国的王希哲先生，一开口便以他出类拔萃的落伍而语惊四座。名不见经传的高寒先生居然也在网上

成了“理论家”，至今的绝活竟然是引用大屠夫斯大林的语录作“学术论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魏京生在父亲节写下的追忆文字。

魏先生在那篇文章里，以他家老先生的个例为证据，否定了我党本质上是个体老粗痞子党的基本事实，却忘记我党从未像满清、北洋和国府那样，实行学者治国，搞的是“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共党中国从来没有哪个党官是胡适、傅斯年、蒋廷黻、张道藩那样的著名学者，而且就连寥寥几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小知识分子都不能容忍，所谓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争，从来是历次党争的重要动因。魏先生以为大学毕业生就是学者，不但连罗隆基在57年说的“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而且似乎忘记了共党内的老粗们连小知识分子都容不下，故魏老先生就是为此而被整肃的。

这也罢了，出奇的是，魏先生竟然说，魏老先生最后总算认识到儿子是对的，其实儿子是在为他没有实现的理想继续奋斗，以期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

这才是让人不能不悲从中来的全民族悲剧，由此可见共党奉革命为国教，以“人民”为神牌的流毒在我们这代人之中几乎是无从消除的了，大约只有“人死病断根”吧。

这悲剧其实凸显了国人平均智力的低下：大家都给我党训练成了高聚焦隧道眼，以为必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去变革才会出现社会进步，而这变革只有一种方式——暴力革命，至于不经人为努力社会也会进步，以及改良也能导致社会进步这些替代方案则从来不经论证地便加以否决。如我在旧作中说的，党把我们的大脑塑造成了开汽车的右脚，见到“革命绿灯”便死蹬油门，见到“改良红灯”便猛踩刹车，那其中有何道理是从来不屑去想一想的。

正因为如此，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便成了“革命以促进社会进步——现状恶化——革原来革命的命——现状更恶化——革革原来革命的命的命”的无限怪圈，真正应了老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谶语，使得中国人民一步步丧失基本人权和自由，使中国社会从晚清那无民主的半自由社会彻底沦为全民变成连信仰自由、感情自由甚至居住自由都被彻底剥夺的准奴隶社会。

而魏先生却竟然看不见这连盲人都看得见的事实，还在梦想用“革革革命”去实现革革革命先辈们没能实现的“民主”理想！

当然，这也怪不得这些老知青们：我们的智力起点实在是太低了。但由此更显出杨小凯先生的卓尔不凡。最难得的是，他不是像许多排斥革命的人那样，只是出自对“以暴易暴”的本能担忧，而是作了雄辩的理性批判。在许多人只停留在感性排斥的阶段时，他便已完成了理性的梳理与论证，这样的哲人，才配得上称为先知先觉。

更难得的是此中显示出来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关怀。对“阶级弟兄”老郑和我为何同途殊归，我也曾作过一番思索，最后的结论是，他当初在革命斗争中卷得实在太深了，所以不可能像我那“逍遥派”那样，保持一种比较客观和超脱的观察立场，这便是他至今无法“断奶”长大的原因。

的确，我在网上看到的蹲过共党大牢的同志，基本都是一副苦大仇深、与共党势不两立的愤青嘴脸。这说来也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应该说是一种有血性的表现——不能设想一个深刻卷入政治斗争，受到中共残暴迫害的人在思考中国问题上能够做到心平气和。但这种发泄毕竟没有什么理性价值可言，更谈不上任何建设意义。所谓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研究前提都是尽可能摒弃主观情绪。

然而杨先生的文字却完全超越了个人恩怨得失。他的狱中回忆当然也是斑斑血泪，但那只是对制度的控诉和冷静的理性批判，看不到什么个人怨怼。他的政论则在在体现出悲天悯人的崇高人道情怀，既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国忧民情怀，也体现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一个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备受我党蹂躏的人能达到这种高度，实在不能不让人由衷折服。

隔行如隔山，我不知道杨先生的专业成就究竟怎么样，是否确属开创了新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但在我看来，那对于我辈这些不相干的人而言其实并不重要，杨先生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自我完成与自我实现，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我辈凡夫俗子可能无法达到他的智力水平、获得他那样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成就，但不管是学到他那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也好，学到他那崇高博大的人道情怀也好，都会是了不起的个人成就。

记得杨先生曾在某篇文字中委婉流露了某种矛盾心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主导社会、干预现实的传统冲动，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致祸之源，但生长在那种传统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明白这个道理，也常常忍不住要去多管闲事，云云。

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此话又再度说出了我的心事。我曾多次抨击30年代知识分子们“逼蒋抗日”、40年代“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深知知识分子乱管国事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灾难根源，自己却又忍不住时时在网上大放厥词，对这些言论可能造成的无法预知的社会后果，也常常有过类似的后怕。

但看了杨先生那篇文章后，我突然得到了启示：或许，老祖宗那逻辑笑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改造后还是可以用于今日的：如果大家把关心国事的精力用来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心取代中共统治的政治家们先把自己改造得比中共领导人更有现代文明知识、更有治国能力，中国的社会进步才更有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有的革命家们从孙大炮以下，统统是“空头政治家”。其实如果中国的领导集团内能有几十个杨先生那样的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定要光明得多。

我想，这就是纪念杨先生的最好方式。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得认同他关于革命和宪政的具体论述。一个多元的世界应该既有革命言论，也有反革命言论，但不管政见如何，只要大家能学到杨先生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博大的人道情怀，国人的素质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在如此国民组成的社会中，不出现巨大的社会进步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了。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夏日读野史：大跃进时代

六者

夏日炎炎，闲来无事。偶翻旧报，读京夫子的野史小说《庐山志异》，重温大跃进的那一段历史，不免感叹唏嘘。当今媒体常喜用“历史上的今天”作专栏标题，故特将1958年的“今天”时段，选出来供网友消遣。所选内容均来自1999年的《中央日报》副刊专栏。

【山大王羞辱赫鲁雪夫】

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後，毛泽东直接掌控住全国经济建设的指挥权。六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捷报频传，竟先发射粮食高产「卫星」，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逐日以显著位置刊出大跃进喜报：

六月九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小麦一仟五佰至两仟斤；

六月十一日，河北魏县，亩产小麦二仟三佰九十四斤；

六月十六日，湖北城，亩产小麦四仟三佰五十三斤；

六月十八日，河南商丘，亩产小麦四仟四佰一十二斤；

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辉县，亩产小麦四仟伍佰三十五斤；

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国县，亩产小麦五仟一佰零三斤；

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县，亩产小麦七仟三佰二十斤；

七月二十二日，福建闽侯县，亩产水稻七仟二佰七十五斤；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县，亩产水稻一万五仟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县，亩产水稻三万六仟九佰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繁昌县，亩产水稻四万三仟零七十五斤；

九月十八日，四川郫县，亩产水稻八万二仟四佰五十五斤；广西环洒县，亩产水稻十三万零四佰三十四斤……

在这同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报纸上撰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宣称广东一年三熟，全省可以达到亩产一万斤；

八月二十二日，安徽省宣布全省早稻平均亩产一千斤，成为全国第一个千斤省；九月十三日，河南宣布自己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十月二十二日，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宣布自己为千斤省。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展开了大竞赛，插红旗，拔白旗。

有趣的是，毛主席的家乡湖南省被中央插了白旗。北面的湖北省，南面的广东省插的都是红旗。於是湖南受到南北夹击，在湘鄂交界处，在湘粤交界处，红旗省都架起了高音喇叭，对著湖南省，高喊反右倾，反保守！湖南当乌龟，湖南是後进！弄得湖南的干部外出都抬不起头。

说是毛泽东每天中午起床後，都要晃著当天的《人民日报》对卫士、护士说：又放卫星！又放卫星了！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有的可能掺了水分，但全国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是发动起来了，这才是大跃进的真正成果。过去人家称我们是东亚病夫，饥饿的国度，现在我们是粮食太多了，多得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怎么办？

毛主席的亢奋情绪，各地的卫星喜报，也使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相信：粮食多得吃不完，仓库装不下，怎么办？

七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雪夫率代表团访问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前往南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握住赫鲁雪夫的手，兴冲冲告诉老大哥党的最高领袖：赫鲁雪夫同志，我们中国正在大跃进，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

赫鲁雪夫没有听明白中国同志放的什么卫星，而且是全国各地都在放？苏联援助你们建造的第一座原子反应炉，还没有开始启动嘛。

毛泽东仍是兴冲冲地开玩笑说：你们去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不到一百斤重；我们今年发射的是粮食高产卫星，最大的一颗是广西发射的，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合六吨半重。安徽、河南、四川三省已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千斤省。

赫鲁雪夫这才听明白了，便坦率地说：我在英、美的报纸上看到了，人家说你们放的是汽球卫星、牛皮卫星……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将它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造谣污蔑。

毛泽东登时脸色不太好看。刘少奇怕毛泽东当场发作，便接下去说：我们正在实行大跃进，一天等於二十年，粮食多到吃不完。

赫鲁雪夫不明白中国同志的数学问题：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怎么能够等於二十年？二十年是多少个小时？於是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不要紧，送些给我们，可不可以？

宾主见面，礼貌周到，彼此不可能深谈。

迎宾车队从南苑机场驶往城内西苑，直抵颐年堂前。刘少奇、周恩来迎接过赫鲁雪夫後便回去了，而由毛泽东主席与赫鲁雪夫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邓小平和陈毅。

毛泽东陪著赫鲁雪夫步入颐年堂会议室。双方成员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两边一一坐下後，先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以赫鲁雪夫为首的苏联同志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谈到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一切事业。现在是全党动手，全民上阵，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全国大跃进，小社并大社，有的地方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准备用五至七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实现工业化，彻底摆脱一穷二白，提前建成社会主义。

毛泽东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的大好形势，经过俄文译员小李的口译，花去了将近一个小时。毛泽东的本意，是希望老大哥的苏联党和政府能够了解中国的大跃进，予以热烈的赞扬和大力协助，并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的大好形势。

赫鲁雪夫却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似的，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敬贺；中国同志在办大喜事，预祝中国党和人民取得巨大的成功。当然，他也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对中国的事情，虽然天天看报纸、听广播、也听汇报，但仍然缺乏了解。

譬如你们的这个大跃进，去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十五年的

时间，在粮食和钢铁等主要国民经济指标上赶上英国，那时我们觉得是可行的。现在你们提前到五至十年超过英国，还要赶上美国，实现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我们就不大理解了。我们苏联以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还会相当吃力呢。美国现在年产钢铁一亿吨，据说你们去年（一九五七年）才七百五十万吨，相差太远了。总之，对你们的这个大跃进，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的情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要分阶段来实现，不可能一步成功。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但我们不是想对中国同志说三道四，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我们也很高兴。社会主义阵营增强实力，何乐而不为？所以绝不会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赫鲁雪夫的劝诫，等於给毛泽东泼了一桶冷水。但毛泽东还是耐下性子，力图劝说苏联同志认识、理解中国经济大跃进的好形势。他说：我们中国党、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以大跃进运动发展经济，是采用中国方式，办中国的事情。譬如一九五六、五七两年，我们在中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入了社，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是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可我们做到了。现在，我们的一些省，一些专区、县，又在办大社，一万人口一个社，搞乡、社合一，取名人民公社，而不叫集体农庄，这就是中国方式。

赫鲁雪夫身子胖，眼睛小。这时一对小眼睛发亮了：公社？你们中国农村正在发展公社？

毛泽东说：是下面自发搞起来的，我们中央还没有决议。初步看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多，一万人甚至几万人一个大社，与乡政府合并，政社合一，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譬如，我们现在许多农村，开始吃公共食堂，我是很赞赏的。

农民吃公共食堂，打破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解放妇女劳动力，打破小家庭、小生产观念，集体吃饭，集体出工，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具备很多的共产主义因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都是我们实行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发明。在我们党内，对这些新生事物，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我和我们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主张大力提倡，大力发展。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给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吹冷风、泼冷水……

赫鲁雪夫却不知趣、不识相似地，还要给中国同志泼泼冷水：主席同志，你知道，在我们苏联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办过农业公社。那是一九二六年左右，史达林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下令把集体农庄合并变成农业公社，取消农民的自留地、自留畜，大搞平均主义。结果引起农业大减产，发生大饥荒，黑面包都吃不上，饿死了两百多万农民……只搞了两年，史达林同志不得不承认失败，才又允许这些农业公社解散，变回集体农庄。我希望中国现在的人民公社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农业公社。衷心祝愿中国同志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总之，我们对你们的情况很不了解，只有你们自己才最清楚。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的。我们尊重你们，唯愿兄弟的中国人民早日富强……下面，我们还是来谈谈国际形势吧，这对我们两党、两国，更重要一些呢。

赫鲁雪夫不抽菸。毛泽东、邓小平、陈毅却是三枝菸枪，不停地冒烟。基本上是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话。

赫鲁雪夫说：国际形势，对亚洲、对东南亚，中国党、中国同志比我们熟悉，我们要多听听你们的；对欧洲、美洲，就应当说我们比你们熟悉。如果实行国际分工的话，我们只能多考虑欧洲、美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些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方面的事情。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说：实行国际分工？什么叫做国际分工？恐怕不妥吧。是的，有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也有些事我们比你们熟悉一些。这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办，去解决，外人不应当去指手划脚，甚至包办代替。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要去干涉。我们共产党人要懂得尊重别国主权，而不是去划分势力范围。赫鲁雪夫同志，你还记得吗？在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现在欧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也都纷纷赞同这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助、和平共处。

赫鲁雪夫说：在外交上，我们也是赞同这五项原则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也要加上你们帮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不妨碍我们帮助这些地区、国家训练地下党游击队。中国就设立有二十几个这样的训练营地嘛。

彼此客客气气，却国内形势谈不拢，国际形势也各唱各调。两人接下来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以及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热核战争的问题。赫鲁雪夫认为，要尽量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热核战争。在热核武器面前，军队只是一团肉酱，地球会毁灭，人类会完蛋。毛泽东则说：我们没有你们那么悲观。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怕打原子弹、氢弹，更不相信地球会毁灭，人类会完蛋。最多死一半，还有另一半。中国七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五千万，有什么了不起？

赫鲁雪夫目瞪口呆了。中国人口可以减少一半？难怪说粮食吃不完……不过，出于对苏、中两党友谊的尊重，赫鲁雪夫还是平静地说：毛主席，你是气魄很大的领袖，我们也正在帮助中国建造原子反应炉。但原子武器只是一张盾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使用的。原子战争不能打，那是人类自我毁灭。

毛泽东很有些看不起这位顿巴斯矿工出身的苏共领袖了：赫鲁雪夫同志，你们不要被自己手里的原子弹吓着了。中国目前还没有造出原子弹，以后造出来了，也可以宣布绝不首先使用。但原子弹也是只纸老虎。我倒是愿意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我福建前线掷下一、两颗，无非死个两千万人口。但那一来，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吃人面目，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了。

赫鲁雪夫同志简直要怀疑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健康问题了。陪同毛泽东谈判的中国党领导人邓小平、陈毅等人也都呐呐无言。

话不投机，毛泽东对赫鲁雪夫失去了兴趣。他不再出席中苏两党领袖的会谈，也不让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只让邓小平、陈毅代表党中央去和赫鲁雪夫谈。你赫鲁雪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的邓小平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总书记对总书记，可以了。况且，你赫鲁雪夫在苏联红军中只被授过中将军衔，我的陈毅外长是元帅衔，已经高过你了。

本来，赫鲁雪夫此次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华，是要与中共中央商谈苏中共同建立海上联合舰队，苏联潜艇在中国设一个基地，苏联飞机在中国机场起降、加油，中苏两国共建一个长波电台供军事用途等重要事项。这些事早在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前后，赫鲁雪夫和周恩来就达成了共识，毛泽东主席当时也很感兴趣：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早在大西洋、印度洋成立了联合舰队，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大国为什么不可以搞联合舰队？我人民海军目前只装备了一些苏军赠送的炮舰，只能近海防御，缺乏远海作战能力，不正好借助老大哥的海上力量来壮大自己？可是，自苏共二十大上赫鲁雪夫作秘密报告大批史达林后，毛泽东对此事就意兴阑珊了，因而一直拖了下来。

代表中共中央与赫鲁雪夫谈判的邓小平、陈毅并没有获得毛泽东主席关于这方面的授权。赫鲁雪夫只好再次要求与毛泽东主席直接会谈。

中苏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仍在颐年堂举行。

一开始，赫鲁雪夫就直奔主题：根据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起降、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和远程潜艇都以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作为基地。但是符拉迪沃斯克港冬天结冰，苏联海军需要不冻港，中国兄弟正可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我们可以搞联合舰队，帮助中国兄弟训练海军。前次中国兄弟还提出过要求，请我们把潜艇设计图纸交出来，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这些我们都愿意。现在是太平洋上不太平，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太平洋舰队在中国水域的活动完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的远程潜艇离基地很远，需要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长波电台……

毛泽东表情严肃，不停地吸菸，默默地听著。赫鲁雪夫打著手势，越讲情绪越高，语调中有些得意。他完全不了解毛泽东心里是怎么想的，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将有强烈的反应。突然，毛泽东抬手朝下一劈，做了个打断的手势：赫鲁雪夫同志，你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我还没有看到你的底牌呢！

赫鲁雪夫一愣，有些尴尬地笑笑：是呀，是呀，毛泽东同志，我还要讲，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大使尤金，是你的老朋友，大约他没有事先向你解释清楚。关于海军的事，我们需要好好商量。我们的援助一向是无私的，这点中国同志很清楚……

毛泽东终是按捺不住了，你个顿巴斯矿工，讲话绕来绕去，耍什么心计？於是抬高了声音

，语锋犀利地问：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联合舰队？是不是要我们把海军交给你们统一指挥？是不是这个意思？

赫鲁雪夫没想到毛泽东同志这么蛮不讲理，又严重误解了他的原意，便竭力解释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好不好？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远程潜艇部队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建立起来，譬如在山东或浙江某地。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活动，可我们的基地远在符拉迪沃斯克，你们中国人称为海参崴……

毛泽东已经脸色发白泛青。坐在一旁的邓小平知道主席已经盛怒，便咳了咳嗽，欲插言缓和一下气氛。没想到毛泽东已经一拍桌子，愤然站立，手指直指住赫鲁雪夫的鼻头问：你讲了一大堆，都不切题。我只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小李，你替我如实翻译！

此情此景，翻译小李只好在译语上加重力度，以图准确表达毛主席的怒意，使赫鲁雪夫充分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陪同赫鲁雪夫会谈的苏方译员也向自己的总书记咬耳朵：毛泽东动火了，总书记您不能火……

赫鲁雪夫亦已是满脸通红。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量平和地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过是来和你们商量问题，是商量商量嘛。

毛泽东盛怒之下，民族情绪大发作，有些口不择言了：什么商量商量？我们还有不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赫鲁雪夫欲站起身来，但他终归没有站起来与之对抗，只是晃了晃他矿工式的宽阔肩膀，目露锋芒，却稍纵即逝。他要顾全大局，他不是来和中国领袖干架的。他摊开

两只粗短的胳膊：毛泽东同志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请不要误解了。我们是同志加兄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开了政治局会议，才来和中国同志商量商量，共同加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的防御力量。

毛泽东听对方并不和他争吵，还谈到了无产阶级的兄弟友谊，只好坐了下来：你这个意思不对，你明明要搞联合舰队！

赫鲁雪夫见毛泽东这样不讲道理，也就有些愠怒地连连摇头，并抬高了声调说：我们不过来和你们相商问题，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如果彼此不能商量问题，我们就很困难了……

毛泽东愣愣地望著赫鲁雪夫，好一会没有吭声。看样子这个顿巴斯矿工颇有城府，要激怒他也不大容易。况且，真的闹翻了，对自己也大不利。可恨就可恨在他赫鲁雪夫全然不把中国的大跃进、七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大好形势放在眼里，非但不表示支持，还语带讥讽，说苏联有过农业公社失败的教训，饿死了几百万农民！你说扫兴不扫兴，混见不混见？

再者，说到海军，说到共同防御海疆，苏联有多少力量？我们有多少力量？新中国创建人民海军，还不到十年。几十艘苏联援助的、过时的炮艇，加上从国民党海军缴获来的几艘战舰，只能近海防御，怎么可能平等地与强大的苏联海军搞什么联合舰队？况且还要在中国沿海搞他们的海军基地，设长波电台，飞机任由起降，那一来，还不处处受制於他们？我们又要丢失主权？

赫鲁雪夫见毛泽东的脸色渐趋平和，以为他生过气後，比较听得进自己的建议，便又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人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在互助合作、物资供应、港口使用方面都没有什么麻烦，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里就连这样一件事情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毛泽东缓缓地吸著菸，眼睛却直盯住赫鲁雪夫：过去，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一些国家的人在我国的国土上作威作福，待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统统被我们赶走。赫鲁雪夫同志，我最後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国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雪夫恼怒了。毛泽东的言下之意，是把共产党的苏联与英、美、日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相提并论，只差没有说沙俄帝国主义了。不过，赫鲁雪夫毕竟是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是位十分难缠的对手。谈判再困难，他也不会与中国党的最高领袖公开翻脸。他叹了口气，又绕了开去，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呢！国际共运、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知道的，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都驻有军队，设有军事基地，为什么在兄弟的中国，就不能商谈有关的事情呢？

毛泽东的右掌从内向外推出，做出断然否定的姿势：赫鲁雪夫同志，你知道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这句话，是我去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并劝说一些兄弟党领导人接受的。为首并不是要当家长，社会主义大家庭不需要家长，需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才能团结一致。

赫鲁雪夫在国际舞台上以政治家的雄辩著称，他性格倔强，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你知道，我们苏联对兄弟的新中国的援助一直是不遗余力的。

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大连海军基地归还中国，我们放弃在新疆的联合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这比你与史达林所签协定的日期提前了二十五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包括援助你们兴建一百四十七项大型工程。其中，单是替你们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炉一项，就使新中国提前进入了原子时代……毛泽东同志，本来我作为兄弟之邦的领导人，作为中国党和人民的好朋友，是不愿意提及这些的……

毛泽东却要跟赫鲁雪夫比意志，比耐力。他并不为赫鲁雪夫充满感情色彩的话所动，只是缓和了声调说：赫鲁雪夫同志，谢谢你提到这些。中国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呢。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谈这个了，好不好？我倒是想详细听听你关于我国经济大跃进的看法呢！肯定的，否定的，都请你谈谈，如何？

赫鲁雪夫真是气得七窍生烟了。他个顿巴斯矿工出身的大老粗，怎么能号得准新中国主席的脉搏？怎么能够悟透一个并不十分艰深的奥秘：只要你热情地赞扬了毛泽东的大跃进，表示出高度的肯定与支持，并把大跃进传扬到全世界去，就一切都好商量，一切都好办呢！

赫鲁雪夫却是一头俄国猪，竟然说：毛泽东主席，对不起，请允许我坦率地说一句，对于你的大跃进，以及以军事手段、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来从事经济建设，我持保留看法！或许中国同志自己，很快就会看到结果的！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这是对毛泽东主席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最为恶毒的诅咒，比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更恶毒的诅咒。毛泽东气得脸色苍白，都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送客。而由邓小平、陈毅、杨尚昆等人陪送苏联同志出到颐年堂门外，与苏联同志热情握手道别。邓小平并告诉赫鲁雪夫同志，按原安排，明天由周恩来总理陪苏联同志游长城、十三陵，后天继续会谈。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总书记问毛主席的俄语翻译小李：主席让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害怕赫鲁雪夫啊？

小李摸不著头脑，小心地请示：我如果有错，请领导同志批评……

邓小平笑笑说：主席问，他手指头指向赫鲁雪夫的时候，小李为什么不指？

小李解释说：我不是怕他。我跟随刘副主席、周总理、彭真同志几位首长多次出访苏联，对赫鲁雪夫还是知道一些的。他能言善辩，个性倔强。我是一名普通译员，也像主席那样以手指指向人家的鼻子，不合我的身分呢。就是刘副主席和周总理，也都不会。

第三天，毛泽东请赫鲁雪夫同志到西苑新建的室内游泳池来举行会谈。这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上，原是露天的，池长五十米，宽十五米，一端设有跳台，池水最深处为七米，可作正规的游泳运动员训练场地使用。中央保健部门为了方便毛主席工作之余锻炼身体，放松筋骨，而建议中央办公厅将其改建成室内游泳池，四周铺上了大理石地板，并装设了恒温设备等。

比起毛泽东来，赫鲁雪夫的脑袋瓜显然是简单多了。他以为毛泽东请他去游泳池谈判，和水有关嘛，是不是在中国设立潜艇基地的事有了转寰的余地？

这天中方的谈判阵营增强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杨尚昆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出席。唯毛泽东主席很随便地穿了件浴衣，光脚板踏了双拖鞋。刘、周、邓、陈、杨陪著毛泽东站在泳池边，边抽菸，边等候客人，边听毛泽东谈辩证法：讲辩证法就是讲变化、讲发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发展。对辩证法不感兴趣，就

是追求安逸平静，不愿改变现状，不敢打破旧的平衡，不愿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充满了辩证法，群众运动、全党运动、全民运动，改天换地。现在下面的干部群众就比我们敢想敢干，他们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一年等于二十年」，就充满了革命的辩证精神……

正说著，赫鲁雪夫到了。今天只邀请了赫鲁雪夫一人。赫鲁雪夫一见毛泽东穿著浴衣，踏著拖鞋，就知道双方不会有什么认真的谈判。

不过双方还是在水边的一圈藤椅上坐下来，喝茶、抽菸，谈了国际形势，中苏双方如何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地下组织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只字不提前天闹得不欢而散的话题。

赫鲁雪夫不再抱什么希望，所谓会谈只是走走过场，表示一下轻松和谐、友谊团结罢了。

会谈结束，毛泽东请赫鲁雪夫同志下池同游。赫鲁雪夫客随主便，换上了游泳裤，套了只救生圈下水。他原来是只旱鸭子，只能在浅水区里「狗刨」几下，就气喘呼呼。他默默注视著毛泽东的泳姿。只见毛泽东熟练地游了一段蛙泳，又改成自由泳，一会又变成仰泳。忽然，毛泽东双臂如桨，两腿如舵，肩头冲起一片浪花，像颗巨大的鱼雷飞速前进，箭一般地前进！

赫鲁雪夫看得目瞪口呆。过去只听说过毛泽东同志善游泳，今天才目睹了他的水上雄姿！看来，中国同志的潜艇，是在他们的泳池里……毛泽东矫健非凡地展现了一番泳技之後，才缓缓向赫鲁雪夫游近，亲切地给他背诵了几句古代乐府……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当中方译员小李把这段古诗的诗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简略地翻译给赫鲁雪夫听时，赫鲁雪夫倒是立即领悟了，毫无恼意，而老奸巨滑地向毛泽东同志伸过手去紧紧相握：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赐浴……

毛泽东哈哈大笑。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恭恭敬敬地站立在泳池边上，却不大笑得出来。

赫鲁雪夫一行七月三十一日抵京。来时没有发表消息。八月三日回去，走时却发了一个公报，强调两党两国的友谊团结、坚如磐石。

毛泽东率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往机场欢送。毛泽东没有与赫鲁雪夫同车。赫鲁雪夫登机前，也没有与毛泽东同志拥抱。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心里一定颇为惶惑，中、苏两党两国，今後大约很难热烈拥抱了。

【毛泽东出巡，徐水县接驾】

八月三日赫鲁雪夫离开北京，八月四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火车出巡。

毛泽东的出巡路线，早就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安排好了：首先视察河北省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再转往河南省新乡县，重点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接著视察襄城县、长葛县、商丘县；再转去山东省历城县；最後於八月十六日转往河北省渤海湾上的度假胜地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大跃进的各项大计方针。

短短十多天时间，要视察三省十县，行程千余里，只能是走马看花式，坐著防弹轿车，前呼後拥，看看公路两旁的工农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谭震林、廖鲁言等人带领先遣小组，已对沿途的省、地、县、社进行了大动员、大布署：一定要让伟大领袖高高

兴兴，看到大跃进的新气象、新面貌、新创造、新成果；看到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冲天，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不回头。

於是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凡是毛泽东将要经过的地、县、社，领导干部竭尽聪明才智，发扬敢想敢干精神，带领农民群众、城镇居民日夜加班加点，对公路两旁的农田进行「美化加工」，营造丰收景象：把边远地段即将成熟的稻子、秋麦、棉花，整棵整棵移栽、挤插到公路两旁来，密密麻麻，形成高产在望的稻海、麦海、棉海。再在四周插上红旗，迎风招展。有的还安装上有线广播，播放革命歌曲：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八月四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抵达河北省徐水县。他已经从一份材料上了解到：徐水县是个先进模范县，去冬以来就开始大跃进了，全县人民总动员，劳动组织军事化，实施大兵团作战，只用三个月时间，就修建起葡萄串式山区水库十七座，满天星式平原水库一百七十三座，一举实现了灌溉自流化，大地园林化，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具备了农村共产主义的雏型。

县委书记张国忠，年轻好胜，精力充沛，应召上专列来见伟大领袖。毛泽东因看过谭震林呈送的材料，很高兴地握住张国忠的手：後生可畏！後生可畏！你是大跃进的突击手，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今年多大年纪了？

张国忠激动地报告毛主席：三十三岁。我们县委一班人大多数都年轻，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

毛泽东说：年轻人好，年轻人包袱小，顾虑少，干劲大。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二十出头当红军师长、军长的多的是。林彪同志当红一军团司令员的时候，也才二十七、八岁嘛。萧华十九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次大跃进，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不搞论资排辈。

接著，毛泽东提议：到你们县的农业社去看看好吗？

张国忠立即欢迎毛主席下车。下了火车，毛泽东拉著张国忠的手，登上了中央警卫局准备好的一辆红旗牌敞篷轿车。四周的路口、河岸、坡地上，早有警备人员布下的散兵线。轿车沿著瀑河河岸缓缓行驶。毛泽东被路旁长得蓬蓬勃勃、密不透风的庄稼吸引住了，忍不住夸赞：这一路的庄稼长势好啊，今年又是个大丰年罗！

张国忠则一路上不停地汇报说：我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六十多万亩粮田，今年计画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还有几十万亩的棉田、果园。今年内要发射两颗高产卫星，一颗是亩产二万斤的谷子卫星，一颗是亩产一百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就是马铃薯。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高产品种。省委、地委准备在我们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谭震林同志、陈正人同志，还有刘少奇副主席都有指示，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兵、商、学结成一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也就是供给制，大兵团生产，大食堂开饭，大炕席睡觉……

毛泽东高兴地听著，连连点头：很好，很好。你们县一马当先，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给全国做个榜样。

汽车路过一座「万头猪场」，一排排兵营般整齐的猪舍。张国忠汇报说：全国共有三十一座这样的万头猪场，实现了一人一头猪。养的都是每头计画长到一千斤的「卫星猪」。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专门长肥膘。猪多粪肥多，肥多粮食多。

毛泽东勾著指头算了算：一人一头猪，每头一千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每人每年一千斤猪肉，干部、群众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当然还要支援国家，让城里人也天天有肉食供应。还可以加工成腊肉、腊肠、肉松、罐头；猪皮还可以制革，猪鬃也是工业原料。牲猪一身都是宝……我可不可以到前面那个村子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

伟大领袖提出要到社员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是多么大的喜讯。张国忠立即向另一辆吉普车上的随手干部招手，让赶快去布置。但毛主席的卫士长追上那名干部说：不行不行，毛主席吃饭的事，有警卫制度呢，说吃就能吃？何况主席也不是真要吃。晚饭再说吧。

汽车往前走了不远，见三面大红旗，社员们分成两组，围著两堆熊熊大火在忙碌。每堆火旁都有一架土制鼓风机，由两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拉得呼啦啦的火苗直窜。毛泽东被吸引住了，问张国忠：县太爷，那又是什么创造发明呀？

张国忠汇报说：是农业社的炼钢厂，两座小土炉，搞土法炼钢。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搞建设要用钢材，国家供应不及嘛。

毛泽东登时兴奋不已，脸发红光，手一挥：停车！土法炼钢了不得，我要好好看一看。

车队停下来。一行人簇拥著毛泽东，来到两座坟堆似的土炉前。社员们个个光赤著古铜色的膀子干的风风火火，见了毛主席也不停手，只是边干活边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滚滚烟尘中问：这鼓风机是谁发明的？张国忠答：是铁匠铺的手拉风箱放大改装成的。毛泽东又问：一天能炼多少炉？张国忠答：八小时一炉，社员们三班制，一天能炼三炉。毛泽东再问：一炉能出多少钢？张国忠答：两百多斤。是公斤还是市斤？是公斤，我们县里采用公斤制。

陪同视察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担心毛主席在烟尘中待久了，对健康不利，也不大安全，便上前提议：主席，土法炼钢的事，回头请土专家们做详细汇报吧。现在是不是回到车上，继续下面的节目……

离开土炉前，毛泽东坚持与几位「炉前工」握了握手，鼓励说：土法炼钢好得很！我们的老祖先就是这么炼的，能出好钢。超英赶美，土洋结合，要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向你们学习！回到车上，毛泽东仍然兴奋不已，和张国忠一起计算著：一炉两百斤，十炉两千斤，就是一吨。如果全国能建起一百万座这种小土炉，一齐上马，一天三炉，每天就出钢六万万斤，折合三十万吨？哎呀呀，一天三十万吨，十天三百万吨，一百天三千万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就是一亿多吨？光是用这种农民的小土炉，我们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下午四时，中央首长的车队来到大各寺庄，又名瀑河集体农庄。这里是徐水县委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试点。农庄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为一座大四合院，庭院整洁，房舍宽敞。会议室可容数百人开会。四墙上挂满了省、地、县各级党委颁发的奖状、奖旗，以及生产规划图表，作物分布图表，工业、手工业分布图表等。还有几幅大壁画，画面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丰富想像：有的画著小伙子和姑娘攀援著原始森林般的玉米杆，上天上去采摘星月；有的画著几名老汉坐上花生壳的巨轮，飘洋过海周游世界；有的画著美丽的嫦娥姑娘，下到农庄的棉田来摘棉花，丰收的棉田白茫茫一片，如同天上的白云一样……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四墙上的奖旗、奖状、图表、壁画一一看过，更是被一种丰收

喜庆的气氛所感染。他忽然有意地问那随在他身后的集体农庄负责人李江生：你们的农庄叫什么名字呀？

李江生先望一眼县委书记张国忠，才回答：叫瀑河第八集体农庄。

毛泽东摇了摇头，表示对这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套用过来的名字颇不以为然，遂说：有第八农庄，自然就还有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罗！河南省新乡县有个七里营乡，他们办起了一个万人大社，取名七里营人民公社。还是叫人民公社比较好吧？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和其他陪同人员，立即异口同声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这名字好！

毛泽东接著说：公社这名字不是从苏联来的。中国古代部落社会就有原始公社。八十七年前，法国巴黎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举行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叫做巴黎公社。公社内人人平等，民主自由，领导人由公社社员选举产生……被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为十九世纪人类的曙光，最伟大的创举。所以，如果我们把农业大社称为人民公社，既有巴黎公社的传统，又包含了共产主义的成份。当然，这个名字现在还是我个人的意见，要等中央开会，才能正式确定下来。

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们，围绕著毛泽东坐下来，抽菸、喝茶。毛主席的香菸、茶杯、暖水壶都是从专列火车上带来的，只有省、地、县的领导者喝当地的茶水。毛泽东笑咪咪地问：今年小麦收成怎样？平均亩产多少斤？

社长李江生回答：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平均亩产小麦七百五十四公斤，再加上一季秋粮。公共食堂现在一天三顿供应白面馍馍，社员们都吃撑了！大家夥说，过去的富农、小地主家里，也难得一天三顿白馍馍。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呀好呀，一个大跃进，就使社员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从前的地、富……你们的秋粮估计亩产有多少？全县都是这个情况吗？

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农村大体上都是这样，夏秋两季加一起，平均亩产两千斤，全县总产计画拿下十二亿斤。

毛泽东勾著指头算了算，惊讶得眼睛都放亮：十二亿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不就人均两吨粮食了？大人小孩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这么多粮食呀？先前在北京，我听谭震林同志他们汇报，今年农民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我还只信一半。现在到你们这里一看，就全信了。你们的粮食这么多，怎么办呢？

张国忠汇报：粮食多了换机器，换化肥、日用品。

毛泽东说：换机器、化肥也用不完。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全国都是这样。你们换机器、化肥，人家也得换。到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说，粮食太多，机器、化肥、日用品不够换，你们怎么办？

社长李江生说：我们可以用山药蛋酿造酒精，成为工业原料。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盖两三座大酒厂来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你们还是没有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毛泽东是兴奋之极了。农业发展得这么快，形势这么好，是他始料未及的。可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那些人，还一个劲的反左倾、反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里，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保守得不能再保守了。他们是瞎子、聋子，既看不到全国的大好形势，又听不到人民群众要求大跃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呼声！幸而自己及时发现，责令他们在党代大会上公开检讨，让他们悬崖勒马、立地成佛；否则，再

让他们反冒进下去，就真要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时间，谁也回答不了伟大领袖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大家只好崇敬而恭顺地望着毛主席笑，个个笑出一脸的愚忠。沉默了一会儿，县委书记张国忠伶牙俐齿地承认：主席啊，我们还是缺乏战略性眼光，光是顾了多增产粮食，没考虑到粮食太多，怎么消耗了。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不要光吃白面馍馍，还要吃水饺、肉包子、油饼、油条、面包，还要造些啤酒、白酒、黄酒、二锅头，多变些花样，来改善、提高生活。还要多养些牛，菜牛和奶牛，既然是共产主义，你们就要多吃些牛奶、巧克力、蛋糕……总之，粮食多了还是好事，不是坏事。多了，国家也收购不了，社员们自己多吃嘛。可以考虑一天开五顿饭，甚至把公共食堂办成流水席，二十四小时随到随吃。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教导大家怎么消费粮食。他已经看到了粮山粮海。省、地、县、社的四级领导人都刷刷刷的记录著他的指示。其实他的消费观念比农民高明不了多少，也只是吃吃吃，变著花样吃，敞开肚皮吃，开流水席来吃。接下来，毛泽东在干部们的簇拥下，观看了农业社的幼儿园，欣赏了孩子们的舞蹈「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宝宝」；又去了幸福院——农业社自办的敬老院，听了几位九旬老人的小组合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又去了公共食堂，果然白面馒头热气腾腾，堆得像金字塔一般。还有两大铁锅的红烧猪肉，香气扑鼻。毛泽东还特意进到大厨房里，和几位大师傅握手，问：你们的伙食办得比城里的工人阶级还好啊，一年四季都这么吃？油水好厚罗！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自大跃进以来，社里就天天都在办喜事，开酒席哩！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很好，看来，离共产主义社会，确是越来越近了。

出了公共食堂，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场院。毛泽东明白，这在南方叫晒谷坪，是收获之後堆放、晾晒粮食的场地。他看到了一座座「山药蛋山」。所谓「山药蛋山」是一种新发明的马铃薯高产种植法：把肥土堆成小山形状，在上面插满薯秧而成。说是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植，这些小山腹部就会结满大大小小的马铃薯，到时候扒拉出来，只见满是马铃薯，不见泥土。

县委书记张国忠始终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这些大跃进以来干部社员们的新发明、新创造。毛泽东说，你们这里的情况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要路线对头，就要钢有钢，要粮有粮，要油有油。人民群众要是真正被发动起来了，就可以移山填海，改天换地。

张国忠汇报说：这些「山药蛋山」，亩产可以达到一百万斤，正在准备发射一颗特大高产卫星……

这回毛泽东是深信不疑了，对四周的随行干部们说：粮食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以後就搞休耕轮作，社员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学文化、学科学、搞娱乐活动。人民公社应自己办大学，办中小学，办图书馆，办公园、游泳池、剧院、电影院。还可以买一两架飞机，让社员们轮流外出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说好不好啊？

面对毛泽东所描绘出来的共产主义美景，大小干部们一片欢呼声：好！太好了！我们一定办到！

在通往徐水县城的路上，毛泽东问张国忠：你们的公共食堂是个新生事物，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啊？张国忠回答：刚开始时是有少数老人思想不通，说吃了大锅饭。毛泽东说：大锅饭比小锅饭香罗。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谁不是吃大锅饭过来的？

张国忠听毛主席称赞大锅饭，受到了鼓舞，便进一步汇报说：我们正在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其余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水井、大车、牲口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社所有、全民所有。群众还要求兴办国营企业。现在农村已取消了小商人，城镇也没有了小商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管住房建筑和分配的组织，实行统建统分配。也就是共产。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来是贫困落后，阶级压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一共产就大跃进，彻底解放翻身。拆了旧房建新居，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娱乐。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共产妙。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房屋、树木、牲口等一切财产合并到一起过日子，人人丰衣足食，生活幸福。

毛泽东没有批评张国忠这种农民式的简单共产主义，而是喜滋滋地听著，不时点点头，觉得这年轻书记很对自己的口味。他觉得张国忠有理想、有干劲，是棵好苗子，以后提拔做个省委书记甚至国务院领导人，都是可以考虑的，前程无量呢。不过还要经过锻炼、考验，让组织部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

毛泽东一行来到中共徐水县委大院。早已等候在院子里的干部职工们一片欢呼声。十几位衣著光鲜、面容姣好的女服务员纷纷挤了上来，争著和毛主席握手。其中两位妩媚的姑娘更是一边一个地扶住了伟大领袖的左右胳膊。这些姑娘都是中共保定地委专门从保定市的医院、学校挑选来，并经过了突击训练的。当时徐水县委内部还议论过：难道我们徐水县三十一万人口，就挑选不出十几名政治可靠、模样儿水灵的妞儿服侍毛主席？但张国忠书记坚决执行了上级组织的决定，保定市的妞儿见识多，模样儿也更水灵，更可人意呢。

女服务员们簇拥著毛主席进到县委会议室。省、地、县三级领导人紧随其后。女服务员立时端来十几大盘切好的红瓤西瓜，请首长们解渴、消暑。坐在毛主席右边的姑娘一边打扇子，一边替他轻轻擦著额上、脖子上的汗珠子；坐在毛主席左边的姑娘则把盘里的西瓜一小块、一小块的切下来，剃去瓜籽儿，插上一枝小牙签儿，再请领袖吃。张国忠书记看在眼里：果不其然吧？还是保定市的妞儿会来事吧？要换了咱徐水县的妞儿，再漂亮也不会有这心眼儿呢。

毛泽东一边吃著西瓜，一边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说：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要就不办，一办就是大办、多办。这里的妇女劳动力也解放得很彻底。

李悦然汇报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哪四台？就是锅台、炕台、磨台、碾台。几千年来，乡下妇女就是围著四台转，锅台做饭菜，炕台做针线，磨台磨粉面，碾台碾玉米、谷子。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公共食堂，社社都办托儿所、幼稚园……看看我旁边这些年轻女同志，就是解放了的新一代。妇女半边天，男女要同工同酬。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是不是这样呀？

十几位女服务员以银铃般的嗓音齐声回答：是这样！妇女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

毛泽东更高兴了。他忽然想起下午在大各寺庄视察时，听张国忠汇报的劳动组织军事化，是个很重要的发明，值得在全国推广。于是他要求张国忠再谈谈这个问题。

张国忠先看一眼地委书记李悦然，之后汇报说：我们也是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被大好形势逼出来的。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只有十一万劳动力，四万劳力修水库、打机井、搞农业；七万劳力修道路、搞工业、炼钢铁。逼得出来个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学习革命前辈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全县成立了

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一声号令，这些部队就可以随时出动。

毛泽东对陪同他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说：这就叫做形势逼人，全民皆兵嘛！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好得很！还有解放妇女劳动力，都是大跃进的新事物。要总结，要推广。一个县就搞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按部队上的四四制计算，四团为一师，四师为一军，九十多个团就是六个军，超过了一个野战兵团的人马，了不起呢！我早就和周总理他们说过，搞经济建设也可以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宿在徐水县委替其精心设置的临时行馆——县委大院中的一座安静小院里。大院、小院被中央警卫局的人马守卫得固若金汤。入夜，包括陪同的省委、地委负责人都不能入内。保定市来的十几名女服务员都争著要替毛主席值夜。地委书记李悦然觉得，一晚上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值夜，便和县委书记张国忠一起，从中挑出两位长相抢眼、性情温顺、发育成熟的姑娘来值夜。张国忠红著眼睛、含著热泪，对那两位幸福不已的姑娘说：记住了，咱是接驾，在咱徐水县，开天辟地头一回。我们这辈子或许就只这次机会！对，是接哪，要被写进历史去的哪！全党全国只有一位毛主席。咱县里没有冷气，天气这闷热，要多准备几盆井水，随时替咱领袖擦个澡儿……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离开了徐水县，前往邻近的定县和安国县视察。毛主席走了，徐水县干部、群众仍然万分激动。

八月四日当晚，大各寺庄为了纪念毛主席视察，连夜成立了人民公社，定名为：徐水县东方红「八·四」人民公社。公社党委连夜修订跃进指标，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三千八百斤跃进到三万八千斤。

八月五日，徐水县委召开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书记张国忠作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报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全县立即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日，全县的二百四十八个农业社宣布合并为九个大型人民公社，一切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归公社所有，公社社员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几天後，又把这九个大型人民公社合并为一个徐水县人民公社，实现了县社合一。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领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组来到徐水，带来了党中央的规划蓝图，正式宣布要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在省、地、县三级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形势喜人，形势也逼人。原先以为至少搞七个五年计画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是保守了，右倾了。

陈正人说：第二个五年计画内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了。除毛主席外，其他的中央领导人没有想到跃进得这么快，今年的钢产量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毛主席给中央常委打了电话，发了指示，炼钢设备采用老祖先的办法，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全民动手，今年就可以搞到二千万吨，明年达到三千万吨。两年就超过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少奇同志也指示在徐水办共产主义试点，搞工、农、兵、学、商结为一体。把全县搞成一个大社，县、社合一，集中领导，统一管理。

北京一位作家名叫康濯的，当时挂职徐水县委副书记体验生活，陪同了毛泽东在徐水视察。几天後，他热情洋溢地写了〈徐水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容光把西边地平线上金黄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徐水城关附近的人们，奔走相告，对於根本不认识的人，也要叫他赶快去看看毛主席。自然有些人没能见得著领袖的面，但是，没见著的虽然惋惜不止，却也和见了领袖的人一样兴奋如狂。大家都说：毛主席没有离开徐水，你看，咱们每个人不是都干劲更足了吗？毛主席一直在咱们面前，鼓舞咱们的干劲呢！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自觉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中央在徐水县办共产主义试点，全国各地干部纷纷前往参观访问，学习取经。三个月内，徐水县接待了全国三千多个单位的几十万人。参观者们都欢欣鼓舞地感到：共产主义已经进了长城，抵达华北平原，就要到达黄河之滨。

其间，徐水县还接待了四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外宾。这些外宾既有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也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节、新闻记者、援华专家等等。同样是那位作家康濯，三十年之后回忆说：

当时来的人对徐水有各种看法。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对徐水的看法是伸大拇指的。当赫鲁雪夫听说徐水搞共产主义时，就让塔斯社记者马上到中国去看看，看徐水搞的是什么共产主义。於是后来赫鲁雪夫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那时候啊，我也很左，人人都左。还有个事，就是这次在徐水视察，毛泽东同志召来了他的红颜知己、年纪小他四十多岁的列车服务员张毓凤，明眸皓齿，娇小玲珑。毛泽东同志因此心情特别好，看什么都顺眼，听什么都相信。我不是说有什么红颜祸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我们都有责任，跟著毛泽东瞎起哄。中华民族很容易瞎起哄……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读诗杂记：中国古代的生鱼片文化

西气东来

生鱼片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食物之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上溯到周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23年。出土青铜器《兮甲盘》上的铭文记载，那一年，周师于今陕西白水县境内的彭衙堡击败入侵的猃狁部落。《诗经·小雅·六月》篇记录了同一次战事，并描述了凯旋归来後，领军将领尹吉甫设私宴招待张仲及其它友人，主菜为烧甲鱼与生鲤鱼片，即所谓“鱠鯉”。 “鱠”字指切细的生肉，也可表示把肉切细的动作。制鱠的材料，有鱼、牛、羊等肉类。秦汉之後，牛、羊鱠极为罕见，鱠几乎仅指鱼鱠，後来又衍生出一个“鮓”字，专门表示生鱼片。“鱠”和“鮓”两字经常混用，但不可与“烩”字混淆；用火加工食物，才叫“烩”。诗《六月》篇是中国北方鱼鱠的最早记录，中国南方缺乏类似的远古文献。直到一千多年後，东汉赵晔才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写道，吴军攻破楚都郢後，吴王阖闾设鱼鱠席慰劳伍子胥，吴地才有了鱼鱠。如果我们相信赵晔的说法，那是在公元前505年。《吴越春秋》的内容，许多来自民间传说，不全可信，但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不妨姑妄听之。鱼鱠在古代是流行食品，可以从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的记载得到证明。这本书收录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奇人奇事，其中一条是：“祝阿不食生鱼”。祝阿（今山东齐河县祝阿镇）的居民不吃生鱼，应劭认为是奇风异俗，所以才书上一笔。祝阿人不食生鱼的习俗，一直坚持到隋朝，在《隋书·地理志》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鱼鱠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组成部份，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唐宋两朝达到极盛，元明以後渐见衰微，到清末成为昨日黄花，终於从中国的主流饮食中消失。

（一）鱼品鲤鱼是最常用的鱼鱠材料。上面提到，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鱼鱠是生鲤鱼片，而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进入饮食市场的鱼鱠也是生鲤鱼片。辛延年的《羽林郎》诗，描叙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调戏在酒店中打工的胡女，受到胡女严拒的故事。诗中姑娘唱道：“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鮓鲤鱼”。辛延年是东汉时人，这首诗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鱼鱠已经在餐馆里出现。鱼鱠进入饮食市场的时间应该早得多，但没有更早的文字记录保存下来。到了唐朝，皇帝姓李，“鲤”字和“李”字谐音，唐明皇於开元三年（715年）和十九年（731年）前後两次下令禁捕鲤鱼，事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但这两道禁令并没有认真执行，平民百姓甚至政府官员都照吃鲤鱼不误。《全唐诗》里面，就有数以十计的与捕食鲤鱼有关的诗歌。第一道禁令发布後一年，少年王维在《洛阳女儿行》诗中写道：“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鮓鲤鱼”，全不给李家天子一点面子。唐敬宗宝历二年（825年）秋天，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到辖区内的松江亭观赏打鱼，他不但不阻止渔民捕捉鲤鱼，而且自己还吃了鲤鱼，有他的《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诗为证：“朝盘鮓紅鲤，夜烛舞青娥”（白天吃生鲤鱼片，晚间看歌妓跳舞）。

名气最大的鱼鱠材料是鲈鱼。西晋末年，吴郡（治所在今苏州市）人张翰在洛阳的司马冏齐王府中任职。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秋天，正是司马冏权势高涨，独揽朝政的时候，张翰看到满天飞舞的黄叶，忽然想起现在正是家乡鲈鱼收获的季节，生鲈鱼片

搭配莼菜羹下菱米饭的滋味何等鲜美，禁不住高歌一曲：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唱罢，随即辞官回乡吃鲈脍解恨去了。不久，司马冏在皇族内斗中被杀，他的许多下属受到株连，张翰侥幸逃过一劫。秋风鲈脍自此成为一个典故，当有人思念故乡时，或憧憬自由自在的江湖生活时，或感觉仕途风波险恶有意急流勇退时，无论老家产不产鲈鱼，都使用这个典故。

但鲈鱼并不是鱼脍的顶级材料。传说孙权曾与术士介象讨论什么鱼做生鱼片最好，介象推荐鲙鱼。孙权叹息道，鲙鱼出在东海，可望而不可及（当时孙权的大本营设在武昌）。介象让人在大殿中央挖出一个小坑，灌满清水，随即从水坑中钓出鲙鱼来。鲙鱼俗称子鱼、乌鱼，鱼肉与鱼子都以鲜美闻名，曾是南宋御膳房中的珍肴，但在古代捕获量稀少，平民百姓难得品尝。唐人杨晔对鱼品另有一说。他在《膳夫经》中把适合做生鱼片的鱼分成三个等级：列入头等的只有鲫鱼，次等的有鳊鱼、鲂鱼、鲷鱼和鲈鱼，再次等的包括鲚鱼、味鱼、鲟鱼、黄鱼和竹鱼。其它鱼在他眼里都不入流。杨晔的观点是否正确，见仁见智，各人口味不同，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杜甫吃过鲂鱼做的生鱼片后，曾赞美“鲂鱼肥美知第一”，北宋诗人刘攽也称道“鲂鱼如玉鲙第一”，而清代名医王士雄主张做生鱼片“青鱼最胜”，“沃以麻油椒料，味甚鲜美，开胃析醒”。

上面提到的鱼类当中，鲙、鲷、鲟、鳊是海鱼，鲤、鲫、鲂、青、鳊、味、竹是河鱼。黄、鲈、鲚是咸、淡水两栖鱼类。但在生殖季节，鲈鱼要从江河里游到近海浅滩处产卵，鲚鱼则要从海里游到江河里产卵，这两种鱼的产地主要在淡水区域。由此可见，中国鱼脍与日本刺身的取材不同，刺身大多用海鱼，而鱼脍大多用河鱼，或在淡水区域里捕获的洄游鱼类。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鱼名都是古名，而古、今鱼名可能完全不同。鲚鱼古代又称紫鱼、鬣鱼、鬣刀或鱮鱼，今名是刀鲚、刀鱼或毛花鱼。黄鱼即今中华鲟。古籍中的鲈鱼（所谓四鳃鲈鱼），今名为松江鲈鱼，属鲈形目杜父鱼科，学名为*Trachidermus fasciatus*。现在中国大陆专业书籍与菜市场中的鲈鱼，是与松江鲈鱼风牛马不相及的、生活在浅海或河口淡水中的鱼类，属鲈形目鲈科，学名为*Lateolabrax japonicus*。北美超市与餐馆里还有第三种鲈鱼—加州鲈鱼。加州鲈是纯淡水鱼，属鲈形目太阳鱼科，学名为*Micropterus salmoides*，中国大陆已经大规模引种养殖，并投放到鱼市场上，俗称大口黑鲈。

《膳夫经》中的味鱼，笔者把它归入河鱼，根据的是杜甫诗《阆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深冬，杜甫路过阆乡（在今河南灵宝市境内），友人姜七设鱼脍宴招待他，所用的鱼就是味鱼。当时黄河已经冰封，鱼是破冰从黄河里捕获的。从季节判断，味鱼不会是洄游的海鱼，而是黄河里的淡水鱼。但因历代杜诗注家对味鱼的说法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使人莫衷一是，味鱼究竟是今天的什么鱼，已经无法确定。

（二）斫脍与刀艺表演日本料理中的刺身，多数是生鱼肉条块，只有河豚刺身等少数几种，才切得其薄如纸，可以透视盘面的花纹。中国古代的鱼脍，讲究切得愈薄愈好，有时进一步切成细丝，称做“脍缕”。曹植在《七启》赋中形容切出的生鱼片薄得象蝉翼、縠（音“hu2”，一种有皱纹的丝绸），松散得像雪花，轻得能随风飘扬：“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切生鱼片专用一个术语：“斫脍”。“斫”字音“zhuo2”，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到现在还是一个活字，笔者老家的乡亲，至今不说“砍柴”、“割草”，而说“斫柴”、“斫草”。切出的生鱼片的质量，与其干湿度很有关系。表面不湿的生鱼片，能够松散地摆放在盘子

里，无论观感和口感都好。紧接着“斫脍”的下一道工序，是把生鱼片倒在干燥的白纸上，使之吸去脍刀压出的鱼汁，有时更用白纸或干布，把生鱼片的表面抹干。但刀功高明的大师傅，不仅“斫”出的生鱼片极薄极细，而且倒在白纸上时，白纸几乎不湿，杜甫为此有诗赞叹道：“落砧何曾白纸湿”。斫脍的刀法很早就有专著出现。明末李晔在《紫桃轩杂缀》里报告，他读过一本“文极奇古”，可能是唐人撰写的《斫脍书》，书中列举的刀法有小晃白、大晃白、舞梨花、柳叶缕、对翻蛱蝶、千丈线等名目。《斫脍书》已经失传，李晔的断代是否正确，各招式的具体细节，都已经不得而知。

斫脍曾是古代文人创作的素材。西晋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饗人（厨师）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霍霍霏霏”，杜甫和苏轼也分别有诗句：“饗子左右挥双刀，脍飞金盘白雪高”、“运肘风生看斫脍，随刀雪落惊飞缕”。是不是诗人们饿急了，跑进厨房督促人家做生鱼片去了？应该不是，而是大师傅从厨房里走出来，在宾客面前表演刀艺，作为进食前的开胃节目。“运肘风生”、“左右挥双刀”，动作夸张，目的显然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有时，表演者还使用挂有小铃铛的刀具一鸾刀，更使斫脍增添音响效果。《西征赋》中“霍霍霏霏”（“霍”音“huo4”）四字一语双关，既描绘切得极薄的生鱼片纷纷飘落的景象，又模拟鸾刀敲打在砧板（俎）上的节奏和音响。晚唐作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记载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斫脍小故事。有一位名叫南孝廉的业余脍刀手，刀功深不可测，他斫脍时，“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切出的生鱼片“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有一次他当众表演刀艺，突然间天昏地黑，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一声惊雷响过之后，生鱼片全部化成蝴蝶飞走。

斫脍也是古代画家创作的题材，在中国美术史料中，著录有三幅有关的古画。第一幅是东晋顾恺之的《吴王斫脍图》，据北宋董道《广川画跋》的记叙，描绘的是上述介象故事的下半截：介象钓出鲙鱼后，孙权令厨师当场表演斫脍，并把加工好的生鱼片分赐给殿中的大臣。第二幅是佚名画家的《王右军斫脍图》，从苏轼的题跋可知，画的是王羲之观赏斫脍的情景。根据画面内容，这两幅画的更贴切的标题应当是“吴王观斫脍图”和“王右军观斫脍图”。第三幅是唐人杜庭睦的《明皇斫脍图》，著录于北宋大内藏画目录《宣和画谱》；北宋灭亡后，一度流落民间，后来又回到南宋宫廷。有关史料光说《明皇斫脍图》中的人物画得如何神妙，却没有说明谁在斫脍。唐明皇风流倜傥，表演艺术的造诣极高，梨园行业尊之为祖师爷，或许会亲自秀一秀刀艺也未可知。这三幅画现在都已经不知所终。其中，以顾恺之的《吴王斫脍图》最为珍贵，其价值不下于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最后提到这幅画的是明末汪珂玉所撰的《珊瑚网画跋》，当时为某陈姓人家收藏，此后再没有人提起过。

表现斫脍的古代美术作品，现在仅存两块宋人画像砖，其中之一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人称《妇女斫脍图》。砖面浮雕的斫脍少妇头梳高髻，身穿交领右衽窄袖长衫，腰系斜格花纹围裙，袖口卷到肘部的左手正在挽起右手的袖子。少妇面前的方桌上，有一块放着一尾鱼的园形砧墩；砧墩右侧，有脍刀一把及柳条串起的鱼三条。方桌左边地面上，有一只装满水的园形瓦盆，可能是用来养鱼的。方桌前面设置一座可移动的大型低矮炉灶，炉灶顶部火舌乱窜，正煮着一锅沸水。这块画像砖出土的年代不明，出土的地点传说在河南偃师县（今属洛阳市）。王国维在《观堂别集·古画砖跋》里曾推测它制作于南北朝以前。1954年春天，从偃师县的一座宋墓里，又出土了一块同样图案的画像砖，才确定了《妇女斫脍图》是北宋初期的作品。

（三）金齏玉脍鱼脍当中最著名的菜肴叫“金齏玉脍”。“齏”有时也写做“齏”，音“ji1”，原意是细碎的菜末，这里作调料解，金齏就是金黄色的调料。金

齏玉脍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书中。在“八和齏”一节里，贾思勰详细地介绍了金齏的做法。金齏共用七种配料：蒜、薑、盐、白梅、桔皮、熟栗子肉和粳米飯。其中，需要解说的是白梅。白梅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食物之一，在醋发明之前，它是主要的酸味调料，做羹汤时必不可少。东晋梅颐编造的《古文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梅就是白梅。在醋发明以后，白梅与醋长期共存，后来终于为醋完全取代。白梅的做法，是把没有熟透的青梅果实在盐水里浸泡过夜，次日在阳光下曝晒，如此重复十遍即得。现在苏州等地出口到日本和韩国，每年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盐渍梅胚”，正是白梅的低盐改造产物。日本料理中至今乃用一种咸梅，是青梅经盐和紫苏叶子腌制的产物。白梅与咸梅之间或许存在渊源关系。把白梅与其它六种配料捣成碎末，用好醋调成糊状，就是金齏。在同一节里，贾思勰还描述了芥末酱的做法。从上下文的意思推测，上菜时，金齏、芥末酱及其它调料与生鱼片分别装碟，食者按自己的爱好自由选用。

《齐民要术》文中，没有限定玉脍用什么鱼。当时，金齏玉脍还是一个集合名词，凡是银白色的生鱼片搭配金黄色的调料，都可称为金齏玉脍。金齏玉脍用做单一菜肴的专用名词，出现在北宋初期李昉等人编辑的《太平广记》里。《太平广记》引用《大业拾遗记》的文字说，吴郡献给隋炀帝的贡品中，有一种鲈鱼的干脍，在清水里泡发后，用布包裹沥尽水份，松散地装在盘子里，无论外观和口味都类似新鲜鲈脍。将切过的香柔花叶，拌和在生鱼片里，再装饰上香柔花穗，就是号称“东南佳味”的“金齏玉脍”。洁白的鲈鱼肉片、青翠欲滴的香柔花叶，再加上紫红色的香柔花穗，使得这道菜的颜色鲜艳夺目。香柔花是什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考证它就是中药香薷。香薷俗名蜜蜂草，新鲜植株具有强烈的芳香气味，古代长期当蔬菜食用。香薷属植物在中国有三十余种，花色嫩黄、浅红、淡蓝、深紫各不相同。金齏玉脍所用的香柔花，可能是开紫花的海州香薷或紫花香薷。

《大业拾遗记》托名为唐人颜师古所撰，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它是宋人的作品。《太平广记》引用的这一段文字说明，至迟在北宋初期，金齏玉脍已经从鱼脍的集合名词，转变成单一菜肴一经香柔花增色增味的生鲈鱼片的专用名词。金齏玉脍有可能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成为单一菜肴的专用名词。盛唐史官刘餗著撰的《隋唐嘉话》记载：“吴郡献松江鲈，炀帝曰：‘所谓金齏玉脍，东南佳味也’”。这条记载把金齏玉脍与鲈鱼联系起来，并说明它是地方性菜肴，但没有提起香柔花。在可能是唐人著撰的《斫脍书》里，也提到过加香柔花的鱼脍，但没有说用什么鱼，也没有点出菜名叫“金齏玉脍”。唐末诗人皮日休在《新秋即事三首》诗中道：“共君无事堪相贺，又到金齏玉脍时”。这是现存唐诗中唯一的一首提到金齏玉脍的诗。皮日休长期在苏州居住，秋天正是当地收获鲈鱼的季节，诗中说的有季节性的金齏玉脍，或许就是香柔花搭配生鲈鱼片这道菜。但这三条资料每一条都语焉不详，不能单独据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只有《大业拾遗记》才给出金齏玉脍的比较完整的描述。

什么地方的金齏玉脍最好？《大业拾遗记》与《隋唐嘉话》都说金齏玉脍贡自吴郡，但史籍记载湖州（今浙江湖州市）的金齏玉脍更为出色。南宋王象之的《舆地胜胜》与祝穆、祝洙父子的《方輿胜览》都把金齏玉脍列为湖州而不是苏州的名产。据《隋书》、《旧唐书》与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的记载：隋炀帝大业初年，废湖州，属下各县分别划归吴郡与余杭郡，湖州的治所乌程县划给了吴郡，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才重置湖州。由此推测，吴郡进贡的金齏玉脍，可能实际上出自湖州乌程县，只是当时湖州已废，乌程县隶属于吴郡，所以才有贡自吴郡一说。

在鱼脍衰微之後，金齏玉脍的含义又一次发生改变，抽象化成为佳肴美味的泛称。清人郑板桥在潍县（今山东潍坊市）知县任上（1746-1752年），写过一组《潍县竹枝词》，其中一首是：“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齏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诗中的玉脍金齏，泛指潍县夜市中形形色色的菜肴，不必再与生鱼片挂钩。

（四）唐宋时尚上文曾引用《风俗通义》与《隋书·地理志》中“祝阿不食生鱼”的记载，反证鱼脍是祝阿以外其它地方的流行食品。唐宋两朝有数以百计的传世诗词，从正面反映鱼脍的流行程度。杜甫於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63年）创作的《丽人行》诗，描写了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与虢国夫人春游时的骄奢场面，诗中有关饮食部份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两位皇姨山珍海味吃腻了，春游时，随行的大师傅起劲地敲打鸾刀表演斫脍，她们还是没有胃口。安史之乱之後，一度太监当权。白居易於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前後创作的《轻肥》诗，描写了身居高位的太监的专横跋扈，他们的饮食是：“尊罍溢九醞，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洞庭桔”是太湖洞庭山的桔子，“天池鳞”指海产鱼类，长途运送到长安，价钱都很昂贵。长安离海岸数千里，不知古人在运输海鱼时，途中是怎样保鲜的。鱼脍也是皇家宴会上的佳肴。五代时蜀主孟昶（934—965年在位）的宠妃花蕊夫人填写的一首《宫词》，描绘了後蜀君臣乘坐游艇在成都锦江上宴乐的情景，写得颇为明快：“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

鱼脍不但是王侯权贵宴会上的珍馐，也是士大夫与平民百姓家中的菜馐。晚唐唐彦谦的《夏日访友》诗，纪录了他事先没打招呼，探访乡居的老友的情形。主人待客的食物中，就有生鲤鱼片：“春盘擘紫虾，冰鲤斫银鲙。荷梗白玉香，荇菜青丝脆。腊酒击泥封，罗列总新味”。宋代诗人苏轼与陆游都嗜好生鱼片，他们现存的与鱼脍有关的诗词分别有十三首和三十七首之多。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职，要到湖州办事，还未动身，先给湖州太守孙觉寄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打招呼，诗中列举了湖州的美味：“顾渚茶芽白於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紫笋茶（即茶芽）与木瓜是湖州的名产，而湖州的金齏玉脍更是远近闻名。苏轼此诗的用意是提醒好友：招待苏轼的时候，可别忘了金齏玉脍。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陆游在严州（今浙江建德市）任知州，有一次在郊外看到漫山遍野白茫茫的荠麦花，感叹良久後写下《秋郊有怀四首》。诗中回忆早年的农耕生活：“颇忆故乡时，屏迹谢车马。水宿依蟹舍，泥行没牛胯。作劳归薄暮，浊酒倾老瓦。缕飞绿鲫脍，花簇赭鲤鲙”。劳累了一天以後，喝老酒吃生鱼片，想必给诗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陆游的故乡山阴在今绍兴市境内，南宋时期山阴农村的开发程度已经较高。但即使在偏僻的山区，生鱼片也是寻常菜肴。与陆游齐名的同时代诗人范成大的《田家》诗，描绘了山村农家与世无争的生活：“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脍小溪鳞。安知曝背庭中老，不是渊明行辈人”。

鱼脍也见於送别和行旅诗中。盛唐诗人王昌龄的《送程六》诗道：“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鱼雪落鲙橙虀。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雲向西”。这首诗写於天宝七载至十四载（758—765年）、王昌龄在流放地龙标任县尉期间。龙标与武冈分别在今湘西洪江市黔阳旧城与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同属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祖先聚居的“五溪蛮”地区，唐代，“五溪蛮”地区开发程度很低，县治大都设山寨里。在这样的“荒蛮”之地，鱼脍亦是人们送别时的食品。宋孝宗乾道五年（1170年），陆游乘船从长江水道入川，途经江西北境的小孤山时，写了《舟过小孤有感》，诗中有：“未尝满箸蒲芽白，先看堆盘鲙缕红”。船到今湖北黄石市西塞山下，恰逢中秋，停靠在长

江中的散花洲边过夜。许多年后，陆游写了《醉中怀江湖旧游偶作短歌》，追述了那天晚上赏月的情景：“散花洲上青山横，野鱼可脍菰可烹。脱冠散发风露冷，卧看江月金盆倾”。从这两首诗可知，过小孤山和散花洲时，船上的菜肴是随地取材的。蒲芽是香蒲的嫩芽，菰是茭白笋，宋代长江岸边与江中沙洲上想必长满了香蒲和菰一类的水生植物，可以顺手采集来当蔬菜食用。在这样的绿色生态环境中，捞捕“野鱼”做生鱼片也不会是很困难的事。

与鱼脍有关的行旅诗里面，当以李白的《鲁中都有小吏逢七朗以斗酒双鱼赠余於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记叙得最为详细。天宝六载（747年），李白携带幼子路过中都（今山东汶上县），一位与李白素不相识，名叫逢七朗的小吏（相当於今天县政府里的普通科员），提着一罐当地酿造的土酒、两尾刚从汶水里捕获的活鱼，兴冲冲地找到客栈里来拜访诗人。李白深为感动，亲自操刀斫脍，与自己诗歌的爱好者对饮尽欢，并在离别时，赠诗一首：

鲁酒若虎魄（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酒来我为倾，鲙作别离处。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肌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筯一餐罢，醉著金鞭上马归。

上面摘录的诗文说明，从北方到南方，从乡村到城镇，从山寨到都会，从茅舍到宫廷，从家居到旅行，从待客到自用，无论春夏秋冬，唐宋两朝先民的食物当中，都有生鱼片。由於缺乏量化的资料，难以估计生鱼片在当时食物中所占的比重，但如用“流行”两字来形容，似乎并不过份。

论及宋朝时，不可忘记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曾统治中国北部达一百零九年之久。据南宋史家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人喝粥、下饭的菜肴“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鱼生就是生鱼片，獐生是生獐子肉。这是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前的习俗。金末名医张从正在医书《儒门事亲》中说：“又如北方贵人，爱食乳酪、牛酥、羊生、鱼脍、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北方贵人”指女真贵族，他们在入主中原后，仍然喜爱生鱼片。女真族完颜王室统治下的中国北部，与汉族赵宋王室统治下的中国南部，在吃生鱼片这一风俗习惯上不存在巨大的差异。

（五）元明余韵蒙古铁骑灭亡金和南宋后，生鱼片也出现在元宫里。蒙族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聚珍异馔》篇，著录了他经手过的，几代元朝皇帝食用过的菜谱，其中一道菜就是鱼脍。这道菜是生鲤鱼片，调料为加芥末爆炒过的薑丝、葱丝、萝卜丝和香菜丝，经胭脂着色，用盐、醋提味。《饮膳正要》的《食物相反》、《食物中毒》、《鱼品》诸篇，也都论及鱼脍，说明元宫里还有其它没有列入《聚珍异馔》篇的鱼脍菜。在民间，吃生鱼片的习俗继续存在。画家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介绍了用生鱼片拌凉面的吃法，颇具创意。鱼脍也见于杂剧、散曲、小令等诸多形式的元曲里。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全剧以谭记儿乔扮渔妇，为杨衙内切脍，趁机盗走皇家信物为中心。这出杂剧为近代京剧《望江亭》和川剧《谭记儿》的原本。在涉及鱼脍的小令里，刘可久的《南吕·阅金经·湖上书事》，描绘了作者与斫脍的风尘妇女调笑的情景，写得生动活泼、别有趣味：“玉手银丝脍，翠裙金缕纱，席上相逢可喜煞。插！一枝茉莉花。题诗罢，醉眠沽酒家”。

到了明朝，白话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在施耐庵的《水浒》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都有鱼脍的描述。《水浒》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里，形容附马王晋卿生日宴会的奢侈排场时，用上了鱼脍：“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碾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

丝，细细茶烹玉蕊”。《三国演义》第十四卷“魏王宫左慈掷杯”中描写了曹操大会众臣的宴会上，左慈从水池中钓出鲈鱼的故事：

少顷，庖官进鱼脍。慈曰：“此脍得松江鲈鱼做之尤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尔”。教取钓竿来，于堂下忽有一池水，慈持竿，顷刻钓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鲈鱼只两腮，惟有松江鲈鱼有四腮，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腮也。

“左慈钓鲈”与上述“介象钓鲈”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相同，两者分别源出干宝的《搜神记》与葛洪的《神仙传》。干宝与葛洪同是东晋初期人，据《晋书》记载，两人不但相识，而且交情非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故事，两种表述”的情形，原因不明。南北朝时，两种版本同时流行，东晋顾恺之《吴王斫脍图》画中的情节与葛洪同一版本；刘宋范晔《後汉书·左慈传》中的故事，则与干宝的版本类似。后来，“左慈钓鲈”的故事编入《三国演义》之中，使其广为流传，而很少还有人知道“介象钓鲈”的故事。

在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第九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篇，以及凌蒙初的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收录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里，也都提到了鱼脍。

但在明朝，鱼脍流行的程度已经大为降低。上列小说里有关鱼脍的故事，全部都是前朝旧事重提。施耐庵等人在写作《水浒》、《三国演义》与《喻世明言》时，都有民间流传的话本为依据。人们不知道小说里的鱼脍，是原始话本的遗存，还是作者当时生活的环境中社会风俗的反映。即使这些描述确实反映了明代的饮食习惯，鱼脍在明人小说中出现的频度也远远低於在唐宋词诗中出现的频度。在其它明代长篇小说如《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及短篇小说集如《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里，都没有见到鱼脍。笔者在明人小说中搜罗到的涉及鱼脍的故事的数量，还不如单独一本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中的多。鱼脍在明代的衰微，还可从金齏玉脍的命运得到印证。上面曾提到金齏玉脍一香柔花拌生鲈鱼片是东南地方的名菜，但到明末，当地人已经不知道香柔花是何物。李晔在《紫桃轩杂缀》里介绍《斫脍书》时，曾对书中所说的“香柔花”是什么提出疑问。李晔是浙江嘉兴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长期在江南水乡任职与生活。像他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不知道香柔花，可见金齏玉脍已经从其发源地的菜单中消失。一叶落而知秋，金齏玉脍被人遗忘，正是鱼脍凋零的标志。

在清代文献里，乃然有鱼脍的记载，康熙十八年与十九年（1679，1680年）夏天，高士奇在西苑无逸殿旁值班，随时准备应对皇帝的谕询。他在此期间写作的《西苑侍直》诗里有：“霑恩饌给银丝脍，宣勅人乘青翰舟”，可知清宫御厨中有生鱼片供应。生活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名医王士雄（1808—1868年）在所著《随息居饮食谱》里也对鱼脍进行了论述，王士雄活动的地域在江浙一带，反映这一地区还有人吃生鱼片。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北方满族和赫哲族的一些村落，以及中国南方许多汉族聚居区，乃遗留吃生鱼片的习俗。生鱼片在中国至今没有断绝，但已经不是主流饮食的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海内外华人的意识里，生鱼片是日本料理，属于异国风味，和中国菜肴毫无关系。

（六）结语古人类都经历过生食的阶段。在发明取火与保存火种的技术之後，吃生肉的习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延续了几十万年。孔子及其门人纂修的，战国时期成书的《礼记·内则》篇，详细开列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食单，其中，生肉占据了可观的比例。在这份食单上，切成薄片或细丝状的生肉有鱼脍、牛脍、羊脍、兔脍（後两者见

於《礼记·少仪》篇)；切成条块状的生肉(称为“轩”)有鹿轩、麋轩、獐轩、野猪轩。秦汉之後，大部份生肉被淘汰，而鱼脍却保存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鱼脍所以能幸存下来，鱼肉本身的性质是最重要的因素。与牛羊等其它肉类比较，鱼肉更适合生吃。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各大菜系中，以日本料理使用生肉最多，而日本料理中的生肉，绝大部份是生鱼，正是鱼肉更适合生吃的有力证据。

如果从公元前823年尹吉甫的那次私宴算起，鱼脍在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达二千八百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鱼脍见於诗词、歌赋、正史、传奇、神话、小说、戏剧、绘画、雕刻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主要利用现存的诗文，本文得出了鱼脍是唐宋两朝流行的菜肴的结论。与此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鱼脍为什么衰落了？笔者在构思本文时，曾做过四个方面的假设。第一，北宋以後，北方少数民族三次入主中原，导致饮食习惯的改变；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北方渔业资源的枯竭；第三，寄生虫在内河各水系的传布，使得在淡水区域捕获的鱼类再不适宜生食；第四，生鱼片与中国各大菜系的发展方向南辕北辙，逐渐被边缘化，最後终於被淘汰。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否定了第一个假设，却不足於支持第二、第三、第四个假设。既然资料不足，对於鱼脍为何衰落的问题，只好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不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有待具有渔业史、医学史、饮食史诸多方面专业知识的高明者。但一种风俗习惯的改变，若不是由于“留发不留头”这类的血腥行政命令，而是静悄悄地、非常缓慢地发生的，要找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也难。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自己的人生

湘君

写下这个并不新鲜的题目，心里有几分疑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自己的人生吗？即便有，那么人活一辈子，又有多少人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呢？

每天早晨我们去上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上班的人生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卖给了那花钱雇我们的人，上班并不是我们乐意的，只为养家糊口，不得不为。即便那些忙忙碌碌自己做老板的人也不见得有多少自己的人生，多数情况下，做老板不过是把自己的人生卖给了金钱，往往是金钱越来越多，而自己的人生却越来越少。晚上下班回家，我们还得首先是充满爱心的丈夫或妻子，孩子们慈祥的爸爸或妈妈，老人们孝顺的子女等等，等这一切都结束，我们也就结束了精疲力尽的一天。好容易等到休息天得点空闲，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去看望年迈的高堂还是找个地方让孩子们开开心心玩一场。于是自己的人生便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

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人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态度活着。在大学上学时，计算机系的中国学生因为要修数学课的关系，都知道数学系有这样一个Graduate Assistant, 美国人，三十多岁的年纪，结过婚，离了，一个人住着。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如痴如醉地喜爱数学。Graduate Assistant 资助每月只有六百多美元，责任是帮助教授批改数学作业，要求是每学期必须至少选修三门数学课。于是这位老兄就一学期接一学期地在学校选课，课余时间总是很牛地坐在数学系的Math Den 里面，一边批改作业或是解数学题，一边等着学生们问他问题。湘君入学时就见他坐在那里，湘君毕业时他仍坐在那里，一年接一年乐此不疲，没有丝毫要离开的迹象。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背地里都拿他当笑话，但湘君实在不知道是应该可怜他还是应该羡慕他。这样的人生，大概是国人无法理解的，在许多国人眼里，这样的人肯定是个失败者，然而，别人认为他如何，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每天开开心心，其乐融融，这对他自己来说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湘君毕业后，在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谋到一份工作，认识了也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的同事弗里德里克·马修。马修是个天分极高的小伙子，高中时就作为州计算机编程竞赛三人代表队成员参加全美编程竞赛，获第三名，上大学时就在这家公司作part time, 湘君进公司时，马修已经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了，业务上的技术难关大多由他攻克。他热爱编程，除了上班外，他的业余时间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基本都花在计算机编程上。二十五，六岁的人了，从来没跟女孩约会过，好象也从未对女孩子有过兴趣。美国不象中国，个人问题，自己不急，没人帮你急，一辈子不结婚也从不会有人问你个为什么。去年年底，在公司如日方中的马修突然辞职不干了，他告诉湘君他的辞职原因是在公司重复地写那些简单的代码太没劲，他挣的钱已足够他三年衣食无虞了，所以准备呆在家里钻研点自己的东西。这些美国人让湘君明白了什么是自己的人生，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科技会长时间地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实难有美国人的那样一分潇洒，我们顾虑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要顾虑朋友的评价，邻居的眼光，同事的议论，领导的看法等等等等，太多的

顾虑常常让我们无所适从。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不在意的，比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因为那本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的许多东西，也许我们真的不必如此在意，人生在世，只要凭良心做人，按原则办事，也就足够了。

毕竟，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的，比如此刻，湘君坐在电脑前打出这篇文章，觉得充实，宁静，至少这一刻的人生，的确是真真实实地属于我自己的。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当代神曲系列：入狱

幽灵

这就是区看守所，开着一对浅灰漆大铁门，武装警卫漠然站在那里。门外地坝外停靠不了几部车，可每年来来往往密集的车辆好多来此装载犯人，凡是几个主要大节日之前，政府为了教育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就从这里提出少数人来枪毙和大批犯人挂牌游街。

这周围是一些农家的住房，很破旧破烂。房前屋后还有菜地，延伸不远就是斜坡下去，那就是犬牙交错的嘉陵江小三峡内，嶙峋的山崖，婉延的江流在九月里已渐渐澄清，顺流而上是美丽的重庆的一大主要景点北温泉风景区，岫石而上是晋云山九峰十八庙，那里有汉晋六朝古迹，有名人诗词，春秋之季，络绎不绝的游人远道而来，瞻仰朝拜。稍北透迤的山峰是钓鱼城，南宋时候中华一代天骄曾在这里抵抗元军数月，元帝被炮火击伤而毙，川军的英武，可歌可泣的英豪仿佛还在飘忽云空。想不到三年之后我成了摄影专业户的时候，每天爬上晋云山峰，登临绝顶，一览众山。

初春的艳阳，深秋的霞辉，林木茂密，山势峥嵘，昔日的情景已成回忆，我看看自己手腕上的镣铐，第一次戴，觉得有点沉，那滋味还真的说不出，又觉得很滑稽。闪亮的手铐上有一锯齿进到接口，一个钥匙口里，就是简单的机械棘轮棘爪撑住单向移动，所以，不用钥匙，就越压越紧。后来才知道监狱里根本不用这手铐，我摸着冷冰冰的手铐，想起电影镜头里的地下党人。可我现在是反革命了，黑五类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活。

那阵云色昏暗，景物蒙蒙，1977年9月十三日，上午那么晴朗，下午变得十分阴沉，大抓捕的日子，天公为之不快。被钢棍单独“照顾”的我，与吓得哆嗦的其他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大门外，据说监狱不收打伤的犯人，他揭了我背花（重庆话意为将背打肿至破皮），而外部的衣服居然完好无损，一点不露痕迹。那时候我还有点功底，承受那一阵钢棍尚不至于昏倒。当我们走拢监狱的门口，里面出来接收的是监狱长，这是个五十开外的长者，方方的脸上有短短的胡渣，双眼斜边，没有颈项的头颅偏偏看人，中等个子，不注意看，要不是在那样的场合，不穿那样蓝色的公安服，谁都不信这就是监狱长，说他是菜农，还恰如其分。他的面容冷静和善，凶相全无，但毕竟是监狱长啊。一如给鬼门关钥匙的鸠山唱词。

他手持着名单，低头抬头，点数看划，随即一招手，我们依次按照他的手向进去，越过铁门，里面有片菜地，地头连接宿舍住宅，随路延伸到一座砖墙，外面一点也看不到高墙，修得很有隐避艺术。我们再转一个壁面就一个单门，正好能容纳一人行走，迎面就是上下插满的铁栏栅，旁边一个岗亭，里面有个挎枪警察执勤。他哗啦开了铁栏门，让我们从很仄的过道进去，监狱长随后。

高墙内突然很开阔一片篮球场大的院坝，连接的一排没有楼层的房屋，对着院坝的另一排房屋一直连和我们进去的右边平行，这排房屋有大半对向院坝，小半和那半部分只有几间的号房相对，中间有几米宽的间隔，平地高出半尺有一米宽的走廊，每间房屋的门上有把大铁锁，一个风门让警成天监视犯人，毫无隐私可言。但犯人有机会伸出

去，慢而小心的侧斜才能挪出，头大就望孔兴叹。只要枪兵懒动，或在岗亭里打瞌睡，这时候的犯人就伸出头来彼此聊天，机会不多但也有。一个门板上一个脑袋，三四个号房里都伸出脑袋的话，可以想象，那镜头多么滑稽。不过，有时候头才伸出，游动的枪兵正好走拢，恶劣的他会悄悄卸下武装皮带，象鬼子进村，突然再扬起黑手，狠狠的一抽，那效果可能挨了的十天半个月不知道自己的姓名。

随着监狱长的指点，我们七八个犯人进了右面第一空屋，（如我在“献技之一“说的那间），他张开双手示意下按，大家明白就蹲下去，这模样很象中国传统式的解大溲姿势。他站在那条桌前说：“听我说，你们今天进来，大家都知道哟，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姓徐，叫我徐管理。大家要遵守监规，不遵守是不行的，每个号房里墙上写有。违反要受到处罚，怎么处罚呢，你们去号房里就有先来的会告诉，我都不说了，嗯，是不是啦，我都不说了。好吧，现在起来把衣服裤子都脱了，通通脱光，把皮带抽出来，东西全部掏出来，放到全面来。”

脱得赤条条的我们，衣服放在地上，放一堆靠近他脚边，就回到墙边站好。门口外有值班的枪兵来去走步，一个担挑饭盒的红毛放下担子，来问徐管理种地的事，守在桶边的是位女工等着，我们都不习惯，这么不雅的，当然，那女工倒没有注目。监狱长对他说了两句，就转身来把我们的衣服以此提起检查口袋，有的东西就扔在地上。我们的钱包，钥匙，手巾等杂物被他分别放在一个簸箕里。看看大家，叫了两人出来让他们面靠墙，把屁股翘起，他从口袋里拿出橡胶手套戴上，一如好莱坞电影里爱伸的中指头，插进了这两个不走运的家伙的肛门。弄得这两人怪模怪样的想扭动又不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监狱长的抽查，考虑有人会带东西进来。万一是越狱工具呢。我想写牛虻的英国女作家伏里契一定没有坐牢的经验，她写的是把锉刀放进馒头，那大概不可能。坐过劳才知道人体功能真多！前几年刘小庆坐牢，大概为此大吵大闹，就是不脱。居然还惊动了中央，下十二道金牌，暗示那可不是基层人员乱动的地方，饶了她这般尴尬，保住了移动库房。当我们都穿上衣服之后，已经没有了皮带，有人就用手提着，这样被领“分配”到各个牢房。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殇高潮

马悲鸣

【按：近见原清华附中仲维光的回忆，提到“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而我认识巴人的小女儿，已经故去。现将旧作贴出，以表纪念。】

高潮

女

1956年1月23日—1978年10月22日

一、初识

我插队回城以后认识的一位后来成为曹思源妻子的女知青聊天时，总爱说“高潮”如何如何的有才情。我也没大在意，只猜想，大概是个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吧。后来我去了北京染料厂当学徒。这位女知青听说了很高兴，告诉我，高潮就在那个厂，并说高潮的英语很好，是她母亲教的。她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

“圣·约翰？！”，我自己的母亲和舅舅、舅妈也都是圣·约翰毕业。那间学校除了中文，连中国历史都是用英文教授。若非解放初期将其解散，至今该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校史了，比北大还悠久。和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就毕业于约大。

我上班以后，和班组里的人混熟了，便问起带班长毛毛，这里是否有个叫高潮的？

他说：“王高潮？有啊。就在太菁绿”。

我们太菁车间按产品不同分成了三个工段。我在翠蓝工段。另外还有一个太菁蓝工段。于是我问毛毛是否跟她熟。毛毛说，熟极了。既然那位女知青在我面前说高潮，想必也会在高潮面前说我。于是我就请毛毛有机会向高潮打个招呼。

一天晚上下班洗完澡出来，见一女工在前面不远处昏暗的路灯下徘徊。她见我走过来便问：“你是马悲鸣吧？”

我说：“是的。你是高潮？”

她也点点头。

我顺便打趣了一句：“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她早就听说过我，已经见到我来上班了。然后说：“我一看你就是干部子弟。”

我极不愿意听这话。自从下乡以来，我一直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出身气质，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能被人看出来。于是我也回敬了一句：“我一看你就是圣·约翰子弟。”她听罢大笑。

过了几天，我舅妈和表弟来北京跑平反，住在她们一位约大同学家。第二天晚上下班高潮一见我就问，有个从上海来的阿姨，带着个男孩，是你什么人？

我听了一愣，我们家的事她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便告诉她，那是我的舅妈和表弟：“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高潮面有得色地说，她是在小成家见到的。小成就是接待我舅妈住的那位约大同学的儿子。

既然高潮的母亲也是约大同学，高潮又经常到小成家去，连他们家的客人都这么熟，我便立刻猜到，小成是高潮的男朋友。

不久高潮的母亲知道了我，便请我去做客。高潮买了个西瓜，切好端上来，一个劲劝我吃。高潮的姨妈也住在她家。

二、共事

染料厂设备老旧，污染严重。整个厂区弥漫着一股化学药剂的怪味，周围一片片五颜六色的积水泛着酸性，滋生了大量蚊虫。染料是非常细微的粉末，我们虽然戴着口罩，但工作一天，仍然是满身满脸的染料，看不出人的模样。每到下班，只见从各个厂房里跑出一群满脸蓝绿色，眨着两只小红眼的蓝鬼和绿鬼冲进澡堂。不一会儿，又从澡堂里出来一群苗条美丽的大姑娘和英俊小伙子。青工讲究穿戴，一个个衣帽光鲜，花枝招展。

我是蓝鬼。高潮是绿鬼。由于戴了口罩，呼吸进来的染料都堆积在鼻翼两侧；摘下口罩就见两个大绿痣；再从橡皮手套里抽出蘸满滑石粉的手抹一抹头上的汗水，脸上又平添了几道大白，那样子比舞台上的小丑还难看。我如此看高潮，想必高潮也如此看我。每在卸装前见到，总禁不住相视而笑。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总比在干校或插队的农村强多了。我中学毕业十一年后才有了这份正式工作。

高潮和我上下班时都爱拿本书在路上看。但只要一相遇，就各自把书塞进提包，聊了起来。当然往往就从“看的什么书”聊起。她看的多是文学外语。我则杂七杂八乱看。从聊天中听得出来，高潮很解，确有才情。

三、赴试

不久，77届开恩科取士的圣旨颁了下来。我和高潮都报了名。她的文学和外语好，但数学不行。那年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我却又因出身不好被刷下来了。高潮妈妈知道后亲自带上我，骑车到处找人疏通，但终是未能奏效。

高潮上最后一班时，特地跑过来看我，鼓励我明年再考。自从被张铁生那张「发人深省的考卷」骂作“大学迷”以来，我已经考过好多年了。每次的成绩都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但总通不过政审这一关。越考脸皮越厚，反正考不上也损失不了什么，不考白不考；即使没人鼓励，我也不会洗手：“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78年再次赶考，小成中了商学院，我则仍旧名落孙山。直到这年十月，各校都开学一个多月了，上头又改变了以出身刷人的制度，我这才算“范进中举”。

我上最后一班时，有个和高潮同一工段的女工前来告别之际，口没遮拦地问我：“高潮是你的女朋友吧？”这话问得唐突。刚认识高潮的当初，我就知道她是小成的女朋友。他们是一个年龄组的。我虽然矢口否认，但那位女工并不死心，便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那时心仪一位共同插队的女生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机会摊牌。我们才是同一个年龄组。所以我只能如实告诉这位工人大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的女朋友”。

这位女工听罢放下脸上的笑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和高潮都考上了大学。”

听说你们俩人的母亲还是同学。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必须告诉你：高潮是个好姑娘。”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一字一顿地笑着答道：“我也知道高潮是个好姑娘。但我还知道高潮的男朋友是个好小伙子。”

她听罢哈哈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那就是你。”

我则坚决否认：“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是个比我更好的小伙子。”

四、祸事

录取我的那间大学刚复课，百废待兴，乱事如麻，不得不推迟开学。我办完入学手续的一天，班长毛毛忽然跑到我家，神色惊慌地告诉我：“高潮出车祸了，你知道吗？”

我吓了一跳，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我立刻拉上他骑车赶去西城的高潮家，一路上我还想着应该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她。

到了她家推门一看，只有高潮的姨妈在家。我冲口便问：“高潮怎么样了？”

姨妈神色黯然地说：“高潮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死亡？！

我的脑袋这才转弯过来，只觉得心头一片茫然，过了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我问高潮的妈妈现在在哪里？姨妈说，在小成家。我又急忙赶到东城小成家。

小成家里人很多，高潮的母亲满脸泪痕坐在中间沙发上，有很多人陪伴。她一见我进来神色不对，就站起来拉着我的双手说：“小马，你是高潮的好朋友。出了这样的事，你可要镇静！以后出门，千万注意交通安全。”

都到了这种时候，高潮的妈妈还只顾安慰我，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也说不出。

高潮是在给小成送电影票时，所骑自行车被一辆军用卡车的保险杠挂住了。司机是个新兵，刚学会开车，没有经验，一踩紧急刹车，高潮便飞了出去，头摔在水泥路面上，当即不省人事；虽然送进医院抢救，但终是没能醒来，几个小时后心脏便停止了跳动。亏小成把持得住，里里外外还都是他在支应。

五、后事

刚开学我便请假去出席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一号室。小成本来请我站在亲友一行。但我还是选择站在染料厂的队伍里，这里熟人多。染料厂排在告别队伍的最后。那位说“高潮是个好姑娘”的女工就在我身旁。我指着远处小成的背影告诉她：“那位就是高潮的男朋友。怎么样，是个好小伙子吧？”她这才点头表示认同。工人的感情纯朴，大家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一朝永诀，都很伤心。

高潮静静地躺在百花丛中，脸上虽然经过修饰，但仍有几块绛红色的淤血。好好一个人，就这么突兀地去了。

我从乡下回来以后的这几年里，不时收到我家长的同学、同事和朋友的平反追悼会通知。每次都是我代表家长去参加，也不记得出席过多少次了。我听惯了那动人心脾的哀乐，一次次体验着生命完结的苍凉。不管悼词如何溢美，死难者的生命是再也无法追回了。但象高潮这么年轻的追悼会，我还是第一次参加。

高潮个子不高，相貌中常，身体瘦弱，但很有情趣，是个解人。她留下了数百首诗

作。我见过其中几首，句子有节奏感，其中不乏苦中寻乐的幽默。她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生性活泼，人缘非常好，朋友特别多，这天都赶来灵堂，排了长长的队伍给她送葬。可惜如此才情的姑娘，阳寿还不到二十三年。

后来我到了美国，和国内的人失去了联系。但见美国人骑自行车都戴头盔，我这才想起来，如果当时高潮戴着头盔，或许就不至于死了。

六、文事

1999年9月1日早晨，我照常来到办公室，打开计算机，忽然发现一个来自陌生地址的电子邮件，日期是8月31日。打开一看，是高潮的母亲从夏威夷发来的，上面用英文写着：“Xiaocheng pass away（小成去世）”。这消息再次使我震惊。

小成后来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一直和高潮的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三年前他在健康普查时发现了肺癌，当时做了切除手术，但后来还是扩散了；一月底去世。我时隔七个月才得知。虽然小成的阳寿比高潮长了一倍，但也不到四十六岁（1953年4月6日—1999年1月31日）。

我自从和高潮相识到她考上大学，同处一厂只有数月；再到她死于非命，总共认识不过一年有奇。我对高潮的所知，仅此而已。虽然关系不错，但我毕竟只是她众多朋友中的一个。如今高潮故去已经二十年了，连小成都已作古。于是我想，还是由我来写篇纪念文章吧。

1999年9月9日于美国

【上次回国得知，小成和高潮的骨灰已经合葬在长城脚下。】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凑兴步韦应物韵

逸峰

逸峰老痴心不冷，再扮登山客。听鸟润滩松，赏花林径石。悠悠仲夏天，穆穆繁星夕。青岭绝尘烟，云深访胜迹。

2004年7月3日逸庐

附录：

一、韦应物原诗：好酒送山中和尚（老杜抄）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二、花和尚：“好烟敬城里居士”雾遮草庵隐，庙破少香客。野鹿迷幽径，寒泉洗青石。山中论甲子，世上争朝夕。烧芋望炊烟，入云无踪迹。三、肥猫：“读诗三拍案，索句九击石”

世相无常形，人生一旅客。读诗三拍案，索句九击石。远念云游僧，沉吟风雨夕。今宵若有梦，当梦随君迹！四、绘里：《贫嘴出公子的幸福生活》鸳帐银灯剔，今宵会艳客。偷香通楚塞，采蜜见秦石。蝶翅扫花径，蜂腰慰雨夕。雾柳一春梦，情残浅深迹。五、一里：“把文度敏思”

龙虫呵手冷，斫脍送行客。岂必河之鲂，无为重如石。把文度敏思，问我沉孤夕。即此去悠悠，池塘春草迹。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